

## 第三章 经学时代

### 一 序言

众所周知,到了汉朝,中国经学才正式开始。当时朝廷罢黜百家定儒一尊,设置太学五经博士,运用政治权势将“五经”法定为官学核心,确立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不过,当时各种经学学派也各有其特殊的性质与出发点。石渠阁(前73—前49)和白虎观(79)的经义会议就是其明证。一般来说,这些经学学派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和东汉末的郑玄通学。

而西方经学的正式肇端,则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四至二世纪的希腊同化时代。由于在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里藏有成千上万的希腊文手抄本,其馆长和研究院士为了给读者提供最佳版本,便致力于馆藏书籍的考辨、校勘等文献整理工作,并由此开始了西方的经学。如曾在此馆工作过的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就编撰了据说长达一百二十卷的图书馆藏书书目;后来接任该馆馆长的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也都师承了第一任馆长泽诺德特斯(Zeonodotus)的校勘方法,成为知名的文献学家。而公元前二世纪时,在亚历山大

城整理荷马史诗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由于将其学术重点转移到了荷马巨作的诠释方面,也因此而成为当时最早最伟大的荷马史诗诠释家。

但罗马时代很重视文法的教育,而比较轻视经学的研究。从事文献整理的文人很少,而且主要因袭希腊同化期大师的小学方法,没有什么创新。只是后来才出现一种新的学术研修样式,即长篇著作的纲要或概略(compendium)。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间,又发生了由写卷到书本的转变,从而为经、传合体研究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 二 泽诺德特斯

#### 1 历史背景与生平

泽诺德特斯(Zeonodotus,约前325—前260)不仅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也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位正式专攻荷马史诗的研究学者,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创立与发展均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其学术道路的开辟是由他的老师菲拉特斯所指引的,这里先作简略介绍。菲拉特斯(Philatas,约前335—前280)是第一位戴上诗人的桂冠(Poietès)而又被誉为学者(kritikós)的历史名人,曾于公元前308年春季被聘为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约前367—前283)儿子的老师。他作为当时最令人诚服的诗人,其挽歌、短史诗和警句等都以诗情细腻微妙和描写精巧而著称。而他被称为学者则是因为他编撰了广泛收录方言、专有名词和荷马史诗新词等的词汇专著,顺应了当时诗歌写作精于措辞技巧的风尚。此书轰动当时诗坛,也为后世学者所广

泛运用。<sup>①</sup>

泽诺德特斯师事菲拉特斯,也继承了其国王太子太傅的职位,并被国王任命为博物馆附属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他亦具有类似老师菲拉特斯的双重身份:诗人与学者,曾被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视为史诗作家,只是其学者的身份被专指为 *grammatikós*——文法家。因为他不但追随老师从事词汇的收集,而且研析文献,进而他又有了另外一个学术上的专称 *diorthōtes*(编辑者)。他的文献整理主要围绕着荷马展开,开创了纯粹学术上的荷马研究,成为古代西方第一位全面而有系统研究荷马的学术专家。为了进一步阐明他非凡的学术贡献,这里须介绍一些当时文学发展和文化环境的情况。

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同化时代的诗人自视为希腊文化伟大遗产的继承者。古代最初有一些史诗诗人以口头吟诵的方法来创作长篇史诗。继而一些演说家也用口头表达方式进行各种辩论。随后又出现了悲剧作家,纷纷写作对话体的悲剧剧本。与此同时,抒情诗人和挽歌诗人的创作也掀起了高潮。再其后又出现了口述言教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其门生柏拉图采用写作的笔法记录了他教诲学生的对话,而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又以科学、逻辑、伦理和文学批评混为一体的综合评论方式,撰写了苏格拉底此前没有传播于世的一些对话。

在此希腊同化时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在于诗歌写作方面。由于当时的诗人十分明了时过境迁、往昔难追,无法企及古代史诗家、抒情诗

人和挽歌诗人的伟绩盛业,于是他们致力于开创新的诗风。其主要特征,如前所述,是以过去的全部诗学遗产尤其是宏大的诗歌词汇作为基础,孜孜以求微妙诗情的刻写和精巧措辞的运用。为此,当时诗人均注重图书馆所藏抄本的利用,力图通过古希腊遗文的广泛阅读来增强自己作诗的能力,同时也借以保存濒临消亡的古代文化遗产。鲁道夫·普法伊佛曾形容当时的情形如下:“以往整个文学世世代代的遗产,尽管有着亚里士多德诸生通过教育而保存的努力,但仍然面临全面危机……此时的首要任务乃是搜集和收藏诸多宝典以永远存留。就在这一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末叶,在埃及出土的最早的残纸草卷显示了此类记录……这些书本成了当时诗歌重新崛起的先决条件,也是当时学术生成和发展的必要载体。”<sup>①</sup>

正是因为当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所能提供的获取知识的机会空前广大,所以很多学生纷纷离开传统的教育圣地雅典而奔向亚历山大城。由于其求学目的已不再是追求辩论的说服力或哲学的真理,因而普法伊佛又给当时的学术下了一个较为狭窄的定义:“有史以来首次有人是为了精通文学而去广泛求学的,即是为了当时新文学的创作和保存并了解以往的作品。这就是特立独行的新学科的学术。”<sup>②</sup>拜占庭学术史专家 N·G·威尔孙(N. G. Wilson)在《拜占庭的学者》里也写下了类似的定义:“Scholarship in the narrow definition of that term (is) the serious study of literary texts”(狭义的学术,指文学

<sup>①</sup> 关于其生平,参见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88—92页。

<sup>①</sup> 关于其生平,参见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02—103页。

<sup>②</sup> 同上,134—135页。

文本的严谨研读)。<sup>①</sup>而在这种学术环境下,泽诺德特斯得以凭借身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的巨大优势,充分利用当时这一世界上最伟大图书馆所藏的诸多宝典来进行学术活动,并使其经典著作的研读引领和推动了当时的新学术运动。

## 2 学术

实际上,泽诺德特斯是以编辑而扬名学术界的。所谓编辑,指通过历史文献的研读校订而整理出新的修正文本。他作为图书馆馆长,可以利用的图书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而作为诗人,在阅读以往作品时又必须从众多版本之中择取最佳善本。这自然而然赋予了他整理校订以往作品和文献的历史使命。泽诺德特斯编辑的对象主要是荷马史诗。此外,他整理出赫西奥德《创神论》(*Theogony*)、品达和阿那克里翁(Anacreon,前570—前488)诗集的校本等。当时的著名诗人埃托利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etolia)和哈尔科弗的利科弗(Lycophron of Chalcis)亦参与编辑,前者负责整理悲剧家,后者负责整理喜剧家。泽诺德特斯当时所采用的编辑方法都是标准的文献学研治手段,如校勘、修订、补遗以及异文、衍文的整理等,从而成为西方文献学的开创者和首位建树卓越的专家。西方文献学,即传统西方经学,也由此而真正发端。

开创西方文献学的泽诺德特斯,曾整理出西方文化史上第一部荷

① 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1页。文学包括纯粹文学(各体诗歌、戏剧、散文)和演说以及史学;因哲学提供了文学写作的范文和典故,亦应收入其内,但就其哲学内容而言,并不能被视为文学著作;科学作品则不能包括在文学之列。

马史诗的校本。马丁·L·威斯特据此称之为“荷马校勘学的开创者”。<sup>①</sup>普法伊佛也在其杰作《经学史》卷1里,分析了泽诺德特斯包括荷马史诗在内的所有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其中所论述的泽诺德特斯整理荷马史诗版本的最大贡献有以下三方面:<sup>②</sup>

其一,校勘版本。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所藏的纸草卷文献极其丰富,多达20—49万卷。<sup>③</sup>亚历山大城作为当时新兴文学写作的中心,也汇聚了众多新文学家及其作品,并保存了繁富的古代文献残卷。但就当时的新作品欣赏和旧文献整理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将其中用不规范文字录写的纸草本,改用当时通用的爱奥尼亚文字(Ionic alphabet)重新誊写。<sup>④</sup>现存的希腊同化时代的古文学残卷约有3026卷之多,荷马史诗残卷也有680卷。<sup>⑤</sup>而泽诺德特斯整理荷马史诗时,则参考了所有的古抄本、誊写本和新写本。其实,校对版本不是他个人所首创的研究新手段,而是其所处的时代和学术环境所能提供和允许的学术活动。

① 马丁·L·威斯特(Martin L. West):《伊利亚特版本与传承的研究》,32页。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05—118页。

③ L·D·雷诺多斯, N·G·威尔孙(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文书与学者:希腊文与拉丁文文学传授之指南》(*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sup>rd</sup>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1, 7页。

④ 同上, 8页。

⑤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 109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斯塔佛尼·威尔斯(Stephanie West):《托勒密时期的荷马残卷》(*The Ptolemaic Papyri of Homer*),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7; 著者整理了20份《伊利亚特》残卷和16份《奥德赛》残卷。另外见俄蕾诺尔·迪克宜(Eleanor Dickey):《古代希腊的学术:寻找、阅读和了解从最早到希腊同化时期的训诂、注释、词汇表和文法的论说的指南》(*Ancient Greece Scholarship: A Guide to Finding,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Scholia, Commentaries, Lexica, and Grammatical Treatises, from Their Beginnings to the Byzantine Period*), Oxford, 2007, 18—28页。

不过,在当时当地,校对版本应该是进行其他学术活动的先决条件。只是泽诺德特斯从事此业,先要应对版本繁多的挑战。普法伊佛曾形容此情形如下:“他面临着结块成团而且多多少少都有出入的抄本;他大概搁置不理诸多通行的草率抄本;虽然现在还保存着几份此类残卷,但他很渴望寻找更佳的善本。”<sup>①</sup>所以,泽诺德特斯首先要从诸多版本中,选出最佳的善本作为研读文本,才得以进行随后接续的分析整理。<sup>②</sup>

其二,分析异文。在这一方面,泽诺德特斯很有远见。当他发现研读文本中错误或属衍文的词语或短语时,并没有将其删除,而是加以特别的记号标明。其记号为 *obelos* ÷; 所对应的词语或句子段落,则被视为其真实性存有疑惑。英文 *obelos* 可以用作动词:“to obelize。”与此相关的一个英文专有名词是“to athetize”(标为错误或衍文)。<sup>③</sup>

其三,修订原文。简而言之,就是泽诺德特斯将所整理的文本中的句子重新排列。其更进一步的整理则是修改有关词语或词组。以马丁·L·薇斯特为代表的一类评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泽诺德特斯全凭凿空无据的揣度来修订原文。<sup>④</sup>而代表传统评论的杜纳兹尔却断言泽诺德特斯修订原文是依据其版本校对的,<sup>⑤</sup>因为他提及所要修订的方法时,多半都有来自不同抄本的证据。还有一派学者持公允的评论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10页。

② 同上。

③ 一部有关荷马版本校勘整理不可或缺的专刊便用此专有名词作为标题,见 G·M·柏岭(G. M. Bolling):《标为错误的〈伊利亚特〉中的句子》(*The Athetized Lines of the Iliad*),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44。

④ 马丁·L·薇斯特(Martin L. West):《〈伊利亚特〉文本与传授的研究》(*Studies in the Tex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Iliad*), K. G. Saur, 2001。

⑤ 海纳利茨·杜纳兹尔(Heinrich Düntzer):《关于泽诺德特斯的荷马研究》(*De Zenodoti studiis Homericis*), 1848, 重印 G. Olms, 1981。

观点,认为泽诺德特斯的修订糅合了其主观的忖度与客观的文献依据。<sup>①</sup>笔者则认同普法伊佛的结论,尊他为西方校勘学和文献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泽诺德特斯还另有贡献。他最早将荷马的两部史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都以一个希腊文字为标号,并对于《伊利亚特》采用大写字体,对于《奥德赛》采用小写字体。他也可能撰写了《伊利亚特的列表》(*Tabula Iliaca*),提供了按照日期排列的伊利亚特的编年纪事史实。尽管他对荷马的版本学作出了如此伟大的贡献,却没有撰写正式的诠释荷马的传注文。后代文法家称其所撰写的荷马传注文,其实出自其所撰写的词汇表。

### 三 卡利马科斯

泽诺德特斯之后,最有名的诗人和学者当属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前310/305—前240)。他出生于当时属于希腊殖民地的利比亚兰尼(Cyrene, Libiya)的一个富绅家庭,曾在雅典修学。可能是由于新首都亚历山大城的王室厚待诗人,他前往定居,在郊外教书,后进入大图书馆工作,其时尚年轻。尽管他承认荷马至高无上的文学地位,但在诗歌

① 见安顿顿斯·伦格克斯(Antonios Rengakos):《荷马的版本与希腊同化时期的诗人》(*Der Homertext und die hellenistischen Dichter*),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3; 弗兰寇·蒙大纳里(Franco Montanari):《古代荷马文献学研究》(*Studi di filologia omerica antica*), Giardini, 1979, 与其“亚历山大时代的荷马文献学:版本格式与异体字”(Alexandrian Homeric Philology: The Form of the Ekdosis and the Variae Lectiones), 载 *Epea Pteroenta.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Kullmann zum 75. Geburtstag*, M. Reichel, A. Rengakos 编, F. Steiner Verlag, 2002, 119—140页。

写作上,偏爱新体诗而排斥史诗体,<sup>①</sup>并不效法荷马,只是以其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不过,卡利马科斯对荷马的诗作很熟,甚至参考研读过多种版本。他写诗重于精雕细刻和琢磨字句,善用深邃的典故,<sup>②</sup>尤其擅长精到的长短格。<sup>③</sup>他的挽歌创作一直影响到了罗马时代挽歌的诗风。<sup>④</sup>其公认的最有名的文学著作是由挽歌构成的四卷文集《艾剔牙》(Aitia)。书名意为“原因”,是指某些城市成立的原因和某些习俗或宗教礼仪的来源等。可惜现今仅存零散的残句。

卡利马科斯作诗力求精巧微妙(leptón “subtle”)的诗境,而不是史诗豪放叙事的完整性。<sup>⑤</sup>因此他非常推崇赫西奥德的较短的文体,而且对以后的诗人服膺赫西奥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⑥</sup>同时,他还虚心地将他作诗的天赋归功于缪斯,声言“我位于那些从小被缪斯所提拔的人物

① 关于他的生平,最详细与最有趣的介绍是阿伦·卡马伦(Alan Cameron)的《卡利马科斯与批评他的人》(Callimachus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 有关其诗歌的英文翻译,见弗兰克·尼色提斯(Frank Nisetich):《卡利马科斯的诗歌》(The Poems of Callimach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斯丹利·洛巴尔多·迪亚娜·蕾尔编(Stanley Lombardo and Diane Rayor):《卡利马科斯:赞美诗、警句、选择的残诗》(Callimachus: Hymns, Epigrams, Select Fragment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本杰明·阿科斯塔·休斯(Benjamin Acosta-Hughes):《多意义的:卡利马科斯的长短格与古代长短格的传统》(Polyeideia: The Iambi of Callimachus and the Archaic Iambic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④ 理查德·亨德尔(Richard Hunter):《卡利马科斯的影子:罗马传承希腊同化期诗歌的研究》(The Shadow of Callimachus. Studies in the Reception of Hellenistic Poetry at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一章。

⑤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38页。

⑥ 汉纳洛·莲士一威尔纳(Hannelore Reinsch-Werner):《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学:借助于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诗歌的传承》(Callimachus Hesiodicus: Die Rezeption der hesiodischen Dichtung durch Kallimachos von Kyrene), Verlag Nikolaus Mielke, 1976。

之列”。<sup>①</sup>普法伊佛曾断言其人格为“具有创意诗人与善于思考学者的完全一致”。<sup>②</sup>其博学多识的赞美诗也证明普法伊佛此论不谬。不过,当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泽诺德特斯去世后,在该馆工作多年而且文名显赫的卡利马科斯竟然没被选为继任馆长,而是由他的学生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担任新馆长。这可能与卡利马科斯注重新诗轻视史诗的诗风有关,而身为史诗作家的阿普罗涅斯因推崇史诗而更加符合具有权势的王室的文学品味,自然受到青睐。关于卡利马科斯的文学贡献,拜占庭第十世纪的百科全书《苏达》(Suda)还有记载称:“他如此勤恳写作每一诗格的诗歌,并撰写了很多散文的作品;事实上他写作了八百卷以上的书。”<sup>③</sup>

另外,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文献的整理,而是在于文献的分类——为图书馆的藏书编写书目。如前所述,以前的学者通常利用此处丰富的藏书来整理史诗家、戏剧家和喜剧家的校本,但他们没有为这些书卷进行纯粹的目录学分类。卡利马科斯则给当时图书馆里成千上万的纸草卷子编了书目,作了作者、书名和体裁等目录学研究的划分和整理工作,定其名为Pinakés“名单”,共有120卷。后来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将此《名单》正式称为《诸学科杰出人物及其著作

① 汉纳洛·莲士一威尔纳(Hannelore Reinsch-Werner):《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学:借助于卡利马科斯的赫西奥德诗歌的传承》(Callimachus Hesiodicus: Die Rezeption der hesiodischen Dichtung durch Kallimachos von Kyrene), Verlag Nikolaus Mielke, 1976, 124页。

② 同上。

③ 《网上苏达:拜占庭词典学》(Suda On Line: Byzantine Lexicography): “Callimachu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29 January 2002. 10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kappa/227>>。

表》(*Tables of Men Distinguished in Every Branch of Learning, and their Works*)。普法伊佛也曾为此作出如下总结：“有史以来卡利马科斯的《名单》将文学上的宝藏通过书目学的分类，即区分诗歌与散文，并按照作者的字母顺序而安排之以利于参考。只有秉承宏大的志向来挽救和保存将要消失的文学传统，以构成万世享用的资料库，才会使它具有如此力量和耐心去进行如此庞大的工程。”<sup>①</sup>

还需要指出的是，卡利马科斯或创造或借用了许多书目学的专用名词，使之首次出现在《名单》上。<sup>②</sup> 其《名单》中的目录学划分，至少有十大部类，包括文法、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历史、哲学、法学、修辞学和医学等；各部类亦分有小部。每部的作家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名。每位作者的条目附带作者生平，但卡利马科斯撰写时避免引用野史或不可靠的轶事，因而有些作者生平比较简短。卡利马科斯还在作者条目下列出作者所有的著作，并对有些著作加以分析与评价。因为《名单》中也列入些许亚历山大未藏书籍，所以并不能视其为卡利马科斯的“知见录”。其中有些仅仅是书籍作者或书名的列表而已。但是卡利马科斯作为诗人，对《名单》中诗歌的处理却较为细致，将所收录的诗人作品，包括无题诗，均列出第一句(*incipit*)以便于查阅。

卡利马科斯的《名单》影响虽大，而且比中国汉代刘向编制《别录》还早了两百年，但不如后者之叙录体详细。其《名单》所提供的资料比较像中国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除了基本的目录学方面的信息

外，还偶尔提供一些作者生平或书籍内容的材料，但还没有达到读书志文体或正式叙录体的信息详尽度。

除上述正式的《名单》外，尚有两部按照年代和文字排列编就的类似著作。其一名为《历代悲剧诗人编年纪事》。<sup>③</sup> 普法伊佛曾推测此部《名单》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撰写的《戏剧表演录》(*Didaskaliai*)。<sup>④</sup> 其二则效法菲拉特斯和泽诺德特斯，其实仅为词汇表，名为《德墨科拉特斯的僻字和著作列表》(*Table of Democritus' Rare Words and Compositions*)。<sup>⑤</sup> 但它们都不如卡利马科斯的《名单》功绩卓越，普法伊佛就对其学术贡献十分称道，赞曰：“此书……以批评的态度来检阅存书，肯定基于作者广泛涉猎馆藏书籍的阅读，并加上了其有关所涉及的文献书籍真伪的讨论。”<sup>⑥</sup>

#### 四 阿普罗涅斯

阿普罗涅斯通常称为罗德的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 of Rhodes, 公元前三世纪)，但他生长在亚历山大城附近地区。他师事卡利马科斯，能作诗写文。由于其诗学比卡利马科斯保守，以致在文学上造成了与后者多年的竞争、敌视甚至相互诽谤。他们冲突的焦点似乎集中在阿普罗涅斯初创的史诗《阿尔戈诺提卡》(*Argonautica*)上。其诗在卡利马科斯看来体裁早已过时，是希腊同化期唯一留存的史诗，共有四卷，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33页。

② 详见罗多幅·巴鲁玛(Rudolph Blum)：《卡利马科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与目录学的来源》(*Kallimachos,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③ 《网上苏达》，“Callimachus”。

④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32页。《苏达》却称其为“老师”的表和录。

⑤ 《网上苏达》，“Callimachus”。

⑥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28页。

每卷约 1400—1700 行,相当于一出戏的篇幅。<sup>①</sup> 史诗故事说的是杰森(Jason)与名为阿尔戈的船上的水手(通称阿尔戈诺提斯(Argonauts)),去寻找传说中的金羊毛。<sup>②</sup> 据说阿普罗涅斯吟诵这一史诗时,表演欠佳,听众反应极其消极,被迫逃离。但他后来避入罗德岛,潜心修改润色,终于将它锤炼成直到现代依然是公认的史诗文体中的杰作,常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相提并论。<sup>③</sup> 阿普罗涅斯也因此一举成名,凯旋亚历山大城。

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说阿普罗涅斯写了几篇史诗,但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sup>④</sup> 不过,在早期纸草卷上的注释里,却为他保留了如下一些较为详细的生平信息:“诗人阿普罗涅斯住在亚历山大城,是文法家卡利马科斯的门生。在该城,他写作此诗并完成定稿,但却遭遇惨败;因难堪之故而转赴罗德;在此地定居,开始教修辞学,自称罗德人;同时修改润色其诗,终于赢取盛赞,罗德人亦赠予其公民身份,厚待之。”<sup>⑤</sup>

① 即符合亚里士多德《诗学》所提倡的史诗——完整的插曲应该相当于一出悲剧的长度;见《诗学》59a—59b。

② 有关英文译本,见理查·亨德尔(Richard Hunter):《杰森和金羊毛》(*Jason and the Golden Fl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E·V·陆(E. V. Rieu):《阿尔戈的航海:阿尔戈诺提卡企鹅经典》(*The Voyage of Argo: The Argonautica Penguin Classics*), Penguin Classics, 1959。

③ 例如 C·R 贝(C. R. Beye):《古代史诗:荷马、阿普罗涅斯、维吉尔》第二版(*Ancient Epic Poetry: Homer, Apollonius, Virgil*), 2<sup>nd</sup> 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彼得·涂海(Peter Toohey):《阅读史诗:介绍古代的叙述文》(*Reading Epic: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Narratives*), Routledge, 1992, 亦主要论述这三位史诗人。

④ 《网上苏达》,“Apollonius.” Suda On Line. Tr. Peter Green. 19 January 2005. 10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alpha/3419>>。

⑤ 《希腊同化期诗人的生平》(*Lives of the Hellenistic Poets*), tr. C. Wendel <http://www.attalus.org/translate/poets.html#apollonius>, accessed 10 March 2010。

阿普罗涅斯继泽诺德特斯之后,接任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但他对前者的荷马版本非常不满,写了一本《驳泽诺德特斯》的学术著作,涉及荷马的措辞和诠释等问题。虽然他整理自己的荷马校本时,也参考泽诺德特斯的版本,但显示了个人的独立见解。按照普法伊佛的考察,阿普罗涅斯比其师更愿意利用以前诸多纸草卷文献上的训诂。<sup>①</sup> 这也就是说他并不局限于只采用当时公认的“定本”。总之,“他与他的老师对于荷马研究的意义是:他们是第一批严谨研究荷马的诠释家,进而开启了后世的注释家”<sup>②</sup>。此外,他也撰写了赫西奥德的校定本。

## 五 阿里斯托芬

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前 257—前 180),与雅典同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约前 446—前 386)有别。他出生在拜占庭,年轻时赴亚历山大城,师从泽诺德特斯和卡利马科斯,六十二岁就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七十七岁时辞世。

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是希腊同化期学术研究的集大成者和西方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人物。其推动西方经学史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 147—148 页。

② 同上, 148。详见安顿颂斯·伦格克斯:《荷马学者的罗德的阿普罗涅斯》(*Apollonius Rhodius as a Homeric Scholar*), 载《罗德的阿普罗涅斯手册》(*A Companion to Apollonius Rhodius*), Th. D. Papanghelis and A. Rengakos 编. Leiden, 2001, 193—216 页。

第一,古代文献校本的整理勘定。普法伊佛曾指出阿里斯托芬以前的学者虽然已经分别整理过史诗、抒情诗、戏剧等三方面的校本,但阿里斯托芬是首位这三方面文献校本都整理过的学者,而且他具有可以参考泽诺德特斯校本等学术上的借鉴优势。<sup>①</sup>他将当时所传承的古文献视为神圣之物,既不轻易删去原文的可疑之处,也不随意把自己所揣度出的修改增补进去,只是用一些如前文所提及的 *obelos* 等校勘符号,书写在文献抄本的切口上以表示自己的意见。阿里斯托芬所使用的这些校勘符号,除了借用泽诺德特斯所发明的 *obelos* 等以外,还有不少是自己发明创造的。比如 *asteriskos* ※,用以表示从他处抄来的句子, *sigma* σ 和 *antisigma* ς,则用来指示两行内容类似而又相连的诗句。<sup>②</sup>据有关统计,在所有现存的古代荷马训诂中,阿里斯托芬的训诂比泽诺德特斯的训诂要少五分之一。这也许显示了他在勘正抄本方面要比后者保守谨慎。<sup>③</sup>

关于阿里斯托芬校勘的谨小慎微,这里仅举一例。在现存的《奥德赛》的训诂中,有关 23 卷 296 行的解释指明“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克以此行作为《奥德赛》真伪的限界。”<sup>④</sup>后来普法伊佛也曾对照过《奥德赛》中与此有关的段落,如:

263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对她答话,说道:

“你呀真怪,为何要我对你讲述,

说告? 好吧,我决不隐瞒,这就对你通报。

266 此事不会愉悦你的心房,对我亦然,一样。

他要我浪迹许多凡人的城市,

带上造型美观的船桨,离家出游,

269 直至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不知……”<sup>①</sup>

他认为从行文的语气与风格来看,《奥德赛》中 296 行以后的部分与疑为伪作的第一章相似,应视为后人的伪作。那么,当初阿里斯托芬是怎么作出同样的结论的呢? 可能是他看到了只写到 296 行为止的古抄本,但更有可能是他深切感受了诗行文气以后才确定的切实判断。而这一训诂对荷马版本史的研究影响深远,迄今依然引人注目。<sup>②</sup>

阿里斯托芬在整理文献时,除了上述标明诗句的真伪或错“简”的位置外,还采用了另外两种类似的标记符号:其一为断句符号。这是阿里斯托芬承袭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前人所使用过的符号。只是当时的断句符号很简单。如在字母下所划的横线就表示诗句的结束。其二为阿里斯托芬发明的标注希腊文字的重音系统,共有高音符“acute”(´),抑扬音符“circumflex”(ˆ)和抑音符“grave”(˘)等三种符号。不过,其所谓的重音“accentation”,所标注的更像中文的声调,而不是英文的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173 页。

② 同上,178 页。L·D·雷诺多斯及 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11 页认为 *antisigma* 是指顺序错排的诗句。

③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174 页。有关荷马的最详细的古训诂著作是哈特穆特·尔比色(Hartmut Erbse)的《荷马〈伊利亚特〉的希腊文训诂》(*Scholia Graeca in Homeri Iliadem*),七卷,de Gruyter, 1969—1988。

④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175 页。

① 陈中梅译:《奥德赛》(*Odyssey*),756—757 页。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175—177 页分析了这个问题。

重音。<sup>①</sup>

阿里斯托芬所勘定的荷马校本之所以颇具影响力,当然要归功于他尊重原文、谨慎改易的严实校勘。同样,他也认真地校定了他的老师以前整理过的赫西奥德《创神论》的校本。<sup>②</sup>此后,其门生阿里斯塔克斯所贡献的校勘版本更胜一筹,不但汇合了所有前人的训诂,而且加上了自己所撰写的传注。这种新型的经传体逐渐取代以往那些只标注技术记号的文献校本,显示了学术发展的新趋势,也很有可能造成了阿里斯托芬所整理的荷马版本被淘汰,以致其残卷和残文都较少存留于后世。<sup>③</sup>

第二,古代抒情诗人著作的整理。尽管阿里斯托芬的荷马校本居功至伟,但普法伊佛认为他有关以往抒情诗人著作的整理更独具只眼,贡献出了可谓“划时代”(epoch-making)的创举。<sup>④</sup>本来,古代抒情诗(lyric poetry)是带有七弦琴“lyre”伴奏的诗歌,各种诗格复杂,加之当时学者未能很好地把握古格律的规则,因此整理这种著作艰难至极。然而,阿里斯托芬在整理这类作品时却创造性地运用了轰动当时文坛的新举措,首次将像散文一样连续书写的抒情诗句分为一句一句有规律断开的新格式。打个比方说,假如《诗经·关雎》原来的书写排列格

式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而阿里斯托芬则把这些诗句,按照节奏单位(metrical unit)的格律,划分为如下的断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然后,他再将这些断开的诗句组合联结为如下成段的诗歌(stanzas):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阿里斯托芬这一诗歌划分组编新法被命名为“colometry”,即按照诗歌格律节奏单位(metrical unit,即诗句)将整篇诗歌组合成有规律、

① 关于阿里斯托芬所发明的重音标注系统,详见克里斯托夫·K·卡拉南(Christopher K Callanan):《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语言学》(Die Sprachbeschreibung bei Aristophanes von Byzanz),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7, 26—30页。

② 奥格斯特·瑙克(August Nauck)编:《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Aristophanis Byzantii Fragmenta), Sumptibus Litteri et Schmidtii, 1848, 59—60页。

③ 他的荷马版本的残文汇集在奥格斯特·瑙克所编《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里, 19—59页。关于此校本的学术贡献,参见格雷格利·纳吉(Gregory Nagy)的《荷马的版本与语言》(Homer's Text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110—130页。

④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81页。

易解读的诗句,对当时和以后的读者造福颇多。只是由于如前所述的此后阿里斯塔克的新版本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所以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古代抒情诗人著作整理的遗文和他所存留的荷马校勘文一样不多,只有五六位诗人著作整理的记载,其中有关品达的诗句训诂较多。

此外,在古代戏剧的校勘方面,阿里斯托芬顺应当时爱尚喜剧的治学潮流,积极整理喜剧家的剧作,而基本上忽略了悲剧作品的整理。

第三,辞典的编写。阿里斯托芬编写词典的经学贡献也值得表扬。他作为文献学家和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充分利用其馆藏文献的诸多版本和其他图书,编纂了在西方词典学上成就非凡的权威性辞书《词典》(Léxeis)。这一著作包括分类词汇、古字(尤其是荷马的措辞)、新字、方言、僻字、俗字和难字等,<sup>①</sup>尤其是词典的词汇分类主题很广泛,对以后罗马时代的词典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②</sup>现存的众多的《词典》残文就足以证明其当初的广泛运用和此后的深远影响。也因此,奥格斯特·璁克在所编的《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一书中,用了五分之三的篇幅,专门分析研讨该《词典》的残文。<sup>③</sup>

第四,经典作家的遴选。阿里斯托芬长久而广泛的阅读自然也培养了其领略文学的良好品味。他据此不但在选择校勘整理对象时,非正式地排列出一批经典作家,而且还着意编写一份各文体最有代表性

的作家的名单:《选单》(Egkrithéntes)。以后罗马时代的西塞罗,也效法此举,并将此类名单定名为 *classici*,意指所录入名单者为“第一流”(英文“first class”)的作家。而阿里斯托芬当时所确立的这一经典作家的基石,以后又演变成了泛称为“亚历山大城经典”(Canon of Alexandria)的“亚历山大城标准名录”,显现了当时的文学品味和标准。其内容包括:1. 史诗家;2. 长短句诗人;3. 抒情诗人;4. 挽歌诗人;5. 悲剧诗人;6. 喜剧诗人(分旧喜剧和新喜剧);7. 历史家;8. 演说家;9. 哲学家;10. 七位当代诗人。<sup>①</sup>

综上所述,阿里斯托芬在西方经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至要作用。近代称誉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文献学家”,<sup>②</sup>非但不是溢美之词,反而似乎未能全面肯定其历史贡献,如他倾力于语法和考古研究方面的成就就难以囊括其中。

## 六 阿里斯塔克

萨莫特拉斯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约前216—前144,一说约前220—前123),与生于萨莫斯岛的古希腊伟大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约前310—前230)同名。前者为阿里斯托芬的门生,在西方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应与其师等同视之,只是各自的术业专攻有所不同。阿里斯塔克可以说是古代诠释荷马史

① 爱勒纳·迪克(Eleanor Dickey):《古代希腊学术:查找、阅读及理解训诂、传注、词典和语法论文的指南》(Ancient Greek Scholarship: A Guide to Finding,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Scholia, Commentaries, Lexica, and Grammatical Treatises),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Book, 2007, 92—93页。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97—202页分析该《词典》所涉及的主题。

③ 《词汇表》的佚文载《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69—234页。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197页,注释3补充介绍了1848年以来有关《词汇表》残卷的新发现。

① “Alexandrian Canon”, <http://www.mlhanas.de/Greeks/LX/AlexandrianCanon.html>, 2010/03/18 下载。

② 奥格斯特·璁克编:《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的佚文》,iii页。

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最有权威的专家。

阿里斯塔克出生在萨莫特拉斯岛,早年迁往亚历山大城师事阿里斯托芬。根据拜占庭百科全书《苏达》的记载,他曾被聘为王室的歌傅。<sup>①</sup>因该官职一向都是由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所兼任,故有合理的推测认为其亦担任了馆长。<sup>②</sup>阿里斯塔克的著作汗牛充栋,“只算专勘”就有800多部,遍布各地学生也有40位之多。他七十二岁时患浮病,转徙塞浦路斯岛后绝食而死。<sup>③</sup>

作为阿里斯托芬的学生,阿里斯塔克也跟随老师整理文献,尤其致力于荷马史诗与赫西奥《创神论》的校勘。上述他所从事的“专勘”,是基于某作家的著作勘定本,一般是其老师的校勘本,再加上自己的意见。阿里斯塔克在这些文献整理工作中,除了采用他老师所规范定准的校勘记号外,还创制了一些被现代专家所确认的新记号,例如 asteriskos ※、diple > 和 dotted diple > > > 等等。其中带有两点的后者,专门用于指出他的校本与其老师的校本在文字上有所出入之处。<sup>④</sup>其实,阿里斯塔克虽然积极参与古代文献校勘,却与其师背道而驰,他的很多定本都是以他的老师的校本作为底本而标上其一己异见。<sup>⑤</sup>他也并不局限于仅用所发明的记号来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还特别撰写了另外发表的别异注释。前面提及的“专勘”就是此类新式传注体。这

①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o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12 June 2000. 10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alpha/3892>.

② 中世纪的记载表明其为图书馆馆长,但没有直接继承其师阿里斯托芬的位置,中间隔了一两个人。见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210页。

③ 《苏达》。

④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11页。

⑤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221页。

里不是说以前的治经大师没有对古代文献提出不同的意见。只不过他们有关版本的意见是借助于校勘记号来表达的,而对于著作内容诠释的异议则是通过口述来传授给学生的。

阿里斯塔克与其师阿里斯托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学术视野特别宏大。阿里斯塔克所编撰的传注,就包括了荷马与赫西奥德以外的小史诗人、抒情诗人和戏剧家等。其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率先为历史家希罗多德的散文体著作作注,并很可能也为修昔底德同类作品写过注释。<sup>①</sup>但阿里斯塔克关于抒情诗人品达的传注受到过抨击,因为他对品达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影响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因而对于其诗文里典故的解释欠佳。<sup>②</sup>

阿里斯塔克在西方文化史上留给后人的印象并不完美,曾被类比为十九世纪英国的拉丁文校勘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8—1936)。两人都因从事过于严谨而乏味的繁琐小学校勘工作,而几近于当时通俗文学里八股先生的呆板形象。<sup>③</sup>所以,现代英文“Aristarch”袭用了阿里斯塔克的名字来形容一个只会吹毛求疵、咬文嚼字的批评家。其实,阿里斯塔克在中世纪被誉为一个万能的校勘修订圣手,以其熟谙荷马的饱学和过目不忘的奇才,精准地勘正所碰到的可疑诗句或异文。从他现存的所有抄本里的训诂来看,其校订训诂的准确性和现代学者的认同度都要比泽诺德特斯及阿里斯托芬高多了。<sup>④</sup>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220、224—225页。

② 同上,221页。

③ 下文将分析豪斯曼对于现代校勘学成熟的重要贡献。

④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12—13页。

在阿里斯塔克身后,其门生由于昏君托勒密八世(Ptolemy VIII,本名埃乌尔太斯二世 Euergetes II,亡于公元前 116 年)的威胁而避难于不受埃及管辖的地区,进而导致了阿里斯塔克的学术传承受到阻滞,也宣告了希腊同化期经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同期的其他学者除了注释家和编辑家狄蒂姆斯(Didymus,约前 80—前 10)之外,在经学研究上并无建树。

其时克拉特斯已受国王聘请定居帕加马从事教学的工作。

为了结束此一章有关希腊同化时代的部分,我们必先分析此“争论”的背景与前景。

## 七 亚历山大城与帕加马之争

### 1 马鲁斯的克拉特斯

拜占庭的百科全书《苏达》中有记载称:阿里斯托芬与当时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allus)“有很多争论”。后者因(Crates of Mallus)生于小亚细亚的马鲁斯而获此名,曾在塔尔苏斯(Tarsus)受教育,是当时斯多葛派主义大师,后为帕加马国王聘请组建了帕加马图书馆并担任馆长。他曾经去罗马旅游,而且由于断腿而停留下来作了一系列启发罗马人开展文法与文学批评研究的演讲,可算是第一位在罗马演讲的希腊文人。《苏达》里有关他的传记条目称其为提摩克特斯(Timocrates)的儿子,来自马鲁斯,是斯多葛派主义哲学家。由于深入研讨文法与诗学的论说,获得了“荷马”及“批评家”的外号。属于托勒密六世(Ptolemy Philometor,约前 186—前 145)时期文法家阿里斯塔克的同时代人物,撰写了《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九卷的校

勘记,等等。<sup>①</sup>

在当时,克拉特斯所用于荷马的寓言诠释法是可以与泽诺德特斯的文献学整理相对照的。如《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 478—608 行描述了一个曾引起历代学者争议的插曲,即诸神的铁匠赫菲斯托为阿基琉斯铸造新盾牌。其开端描写盾牌的诗句如下:

他首先锻造一面巨大、坚固的盾牌,

盾面布满修饰,四周镶上三道

480 闪光的边圈,再装上银色的肩带。

盾面一共有五层,用无比高超的匠心

在上面做出许多精美的点缀装饰。

他在盾面绘制了大地、天空和大海,

不知疲倦的太阳和一轮望月满圆,

485 以及繁密地布满天空的各种星座,

有昴星座、毕星团,还有猎户星座,

以及绰号称为北斗的大熊星座,

它以自我为中心运转,遥望猎户座,

只有它不和其他星座为沐浴去长河。

490 他又做上两座美丽的人间城市,

<sup>①</sup> 克拉特斯(Kratēs), Suda On Line. Tr. Malcom Heath. 8 May 2002. 18 March 2010 (<http://www.stoa.org/sol-entries/kappa/2342>).

一座城市里正在举行婚礼和饮宴，  
人们在火炬的闪光照耀下正把新娘们  
从闺房送到街心，唱起响亮的婚歌。  
青年们欢乐地旋转舞蹈，长笛竖琴  
495 奏起美妙的乐曲，在人群中间回荡，  
妇女们站在各自的门前惊奇地观赏。  
……<sup>①</sup>

同时，这一盾牌上的装饰被形容成了带有十个同心圆而且来源不一的图景：(1)天、地、海、太阳、月亮、星座；(2)一座进行婚礼与决狱断案的城市；(3)被围攻的城市；(4)正在耕种的田地；(5)收获中的国王庄园；(6)葡萄园和摘葡萄的农夫；(7)攻击一群牛的两头狮子和企图保护牛的牧人；(8)养羊的牧场；(9)年轻人跳舞的舞场；(10)海洋般的大河。<sup>②</sup>

泽诺德特斯曾认为此段插曲的风格和行文与《伊利亚特》中大部分的诗文大相径庭，而且除此之外在荷马其他所有的诗文中也没有类似的<sup>③</sup>主题表现，因此觉得难以处理，最后只好用 *obelos* 的记号来表示其为“<sup>④</sup>疑衍文”。但克拉特斯却以寓言的诠释法来解释其为天空的十个圆

① 罗念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478—479页。

② 安德鲁·S·巴克(Andrew S. Becker)：《阿基琉斯的盾牌和以文字展示视觉图像的<sup>⑤</sup>诗学》(*The Shield of Achilles and the Poetics of Ekphrasis*)，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5；斯蒂芬·斯克利(Stephen Scully)：《解读阿基琉斯的盾牌：恐怖，愤怒，喜悦》(*Reading the Shield of Achilles: Terror, Anger, Delight*)，*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101(2003)：29—47页。

圈。普法伊佛为此写道：“按照他的意见，这些诗句的独特性是行得通的，因为它们借文字的帷幔来表示诗人的基本宇宙论，只有哲学家的诠释才能够揭开此序幕。”<sup>①</sup>

## 2 经学上的竞争

当时土耳其小城帕加马的国王志在与亚历山大城争强斗胜，亦建立了图书馆，并广招大师来任教，使得两地变成了学术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如果比附中国汉代今、古文之争来观照这两地学者学术上的差异，可以说，亚历山大城学派近似古文学派，注重文献的整理、精读和文字章句的训诂注释；而帕加马学派却类同今文学派，偏爱斯多葛派主义的寓言诠释法、泛读，善于发挥微言大义、德育教诲和文学道理(*lógos*, “reason”)。此外，两地学派还有其他一些区别。比如前者以批评与欣赏的态度去阅读文学作品，后者则对此采取访古问道的姿态；前者有五大学者效法承传，后者却只有一位大师——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克拉特斯，而且弟子很少，且无任何再传弟子；前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在资料 and 人才上的优势，可以较为方便地鉴别帕加马所制造的赝品抄本，而后者则利用当地羊皮制作业之盛来破解亚历山大城当时所实行的出口纸草卷的禁运。(帕加马古音韵的演变也可以作此证明：*Pergamum* (古地名) → *pergament* → *parchemin* → *parchment*(羊皮卷))。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1，240页。

## 八 罗马时代的经学

### 1 背景

罗马文学于公元前三世纪出现。李维·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约公元前280/260—前200)将包括荷马的《奥德赛》在内的希腊文学译成拉丁文,作为贵族私塾的课本。他还依据希腊戏剧的模式,编写拉丁语的悲剧、喜剧等。因此,西塞罗与伟大的抒情诗人贺拉斯(Horace, 前65—前8)都视其为罗马文学之父。

其后,格努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 约前270—前201)基于希腊文学的灵感与体裁范型,写出了罗马文学史上第一部史诗《布匿战争》(*Bellum Punicum* 七卷),并奠定了以后所有罗马史诗的风格和色调。<sup>①</sup>而他根据罗马历史写作的戏剧(*fabula praetexta*)和诗歌,富有别于希腊文学的罗马特色而独具特殊的文学价值,因此被后世视为具有罗马文化特色的文学之父。稍晚些的昆特斯·恩纽斯(Quintus Ennius, 约前239—前169)不但写悲剧更为出色,<sup>②</sup>而且其叙述罗马历史的史诗《编年史》(*Annals*)也变成罗马孩童的课本,直至公元前二世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问世并在社会中上层流行以后才被取代。<sup>③</sup>

① 森德·格·尔布革(Sander M. Goldberg):《罗马时代的史诗》(*Epic in Roman Ti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53, 73—82页。

② H·D·周色林编(H. D. Jocelyn):《恩纽斯的悲剧》佚文》(*The Tragedies of Ennius: The Frag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布克斯(R. A. Brooks):《恩纽斯和罗马的悲剧》(*Ennius and Roman Tragedy*), Ayer Co Pub, 1981。

③ 欧都·斯库兹(Otto Skutsch):《昆特斯·恩纽斯的编年史》(*The Annals of Quintus Enni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随着各种文体文学的流行,私家图书室也开始出现。其中唯一保留至今的古代图书室,是遗存在意大利赫库兰尼姆镇罗马时代纸草卷别墅(The Villa of the Papyri)里的。其主人是凯撒的岳父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凯搜尼怒斯(Lucius Calpurnius Piso Caesoninus)。当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火山灰掩盖了此别墅以及里面的书房,所藏的1700多个纸草卷均被炭化,硬化成凝灰岩状文物。自从1750年第一次发掘此处藏书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试图打开纸草卷以阅读其中内容。可是后来设法打开以后,又发现里面的文字全是一片黑色。直到现代采用了先进的多光谱成像方法,才得以成功解读。原来这些用希腊文书写的纸草卷文献主要是有关享乐主义的哲学内容,目前保存的共有1785卷。因为古代罗马图书馆的馆藏方法是把拉丁文与希腊文卷子分开收藏的,所以其处所藏的拉丁文卷子一定还在别墅某处,尚未被发掘出来。<sup>①</sup>

至于当时正式的公立图书馆,据说有名的学者瓦罗(Varro, 下文介绍)曾应凯撒的召命草拟组建的计划,但最后落空了。直到公元前39年,才由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C·阿斯尼优斯·珀莉欧(C. Asinius Pollio, 前76—5年)建立了第一家公立的罗马图书馆。<sup>②</sup>

### 2 文法家

罗马时代正式的经学研究应该是由亚历山大的学者狄蒂姆斯和克

① 司德尔(David Sider):《赫库兰尼姆市德义帕批利庄园的图书室》(*The Library of the Villa Dei Papyri at Herculaneum*), Getty Publications, 2005。

②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 23页。

拉特斯访问罗马所推动的。前者访罗马时介绍了亚历山大城学者的文献整理方法;后者以外交官的身份出访罗马时,由于跌落水沟而断腿,只好留下疗养,并趁机讲学,介绍帕加马学术界研究文法的方法。<sup>①</sup> 结果,使得当时罗马的文法研究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城的同类研究,连阿里斯塔克也承认这一点。<sup>②</sup> 而在此之前,罗马的文人学者只是进行了一些有关奈维乌斯的《布匿战争》和恩纽斯的《编年史》这两部史诗的初步研究。

L·艾黎优斯·斯替娄(L. Aelius Stilo, 约前 154—前 74)是罗马本土第一位系统研究和批评拉丁文学的文献学家。因为罗马文献学是在文法研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所以当时的文法家(grammarian)就是文献学家的通称,其研究范围自然包括文法的分析。斯替娄原先教修辞学,替人编写演讲,因而他取名为 Stilo(*stilus*, 笔)。他也教授斯多葛派的思想,其学生中有西塞罗和瓦罗。公元前第 100 年,他出于爱国的情志,自愿跟随一个政客流放到罗德岛,在那里很有可能结识了正在避难的阿里斯塔克的一位门生,向他学到了亚历山大城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斯替娄应为首位在罗马运用亚历山大城学术界校勘符号的学者。<sup>③</sup>

当时斯替娄最杰出的学术贡献之一,是通过文献学的整理来鉴定早期喜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 约前 254—前 184)的遗著。普劳图斯共

写作了约 52 部喜剧(现存仅有 20 部)。斯替娄鉴定其中只有 25 部为真品,其余都为赝品。

斯替娄的门生瓦罗(Varro, 前 116—前 27)也是当时博学通识的学者,文学、历史和科学都在其研讨视野之内,尤其精通语言学研究。在他七十多部著作中,现存较为完整的仅有二部。其一为 25 卷的《关于拉丁语言》(*De Lingua Latina*),分为辞源(卷 1—7)、变格及其他文法上的变化规则(卷 8—13)和句法(卷 14—25)等三部分,现仅存第 5—10 卷。<sup>①</sup> 其二为《农村事业三书》(*Rerum rusticarum libri III*),包括 I: 农业与农场管理, II: 羊与牛, III: 畜牧, 养蜂等。<sup>②</sup> 他也编撰了很有影响力的《瓦罗纪年》(*Varronian chronology*)和《学科九书》(*Nine Books of Disciplines*),涉及文法、修辞学、逻辑、数学、几何、天文学、音乐、医学和建筑学等诸方面,为以后中世纪“三种学道”(Trivium)和“四种学道”(Quadrivium)的课程内容打下了基础。

但瓦罗在文献整理校勘中与他的老师斯替娄颇有不同:后者仅以小学方法来鉴定文献,而他则还要进一步考订出文献抄本的衍文或错字,也就是说不仅鉴定文献同时也进行属于校勘学的原文订正工作。<sup>③</sup> 因为在当时文献抄本的诗句中常夹写着僻字的定义,很容易在传承当

① 柔纳尔德 G·肯特(Ronald G. Kent):《瓦罗:关于拉丁语言,第一卷,5—7 册》(*Varro: On the Latin Language, Volume I, Books 5—7*),《瓦罗:关于拉丁语言,第二卷,8—10 册,佚文》(*Varro: On the Latin Language, Volume II, Books 8—10. Fragment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8; 但以尔 J·泰利尔(Daniel J. Taylor):《变格:瓦罗语言学理论的研究》(*Declinatio: A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Marcus Terentius Varro*),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② W·D·胡坡(W. D. Hooper):《卡托和瓦罗:关于农业》(*Cato and Varro: On Agricultur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34。

③ L·D·雷诺多斯及 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22 页。

① L·D·雷诺多斯及 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20 页。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1, 272—274 页记载了包括狄蒂姆斯在内的四位曾访问或迁居罗马的亚历山大城学者。

② 同上,245 页。

③ L·D·雷诺多斯及 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21 页。

中被误作原文而成为衍文<sup>①</sup>，所以须要辨别勘正。瓦罗在此方面亦有收获，如在普劳图斯的遗著中就鉴定出了21篇确凿无疑的真品。此外，瓦罗还追随当时的治学风尚，编撰了便于文献研究的词典。

在当时，教育归属文法家所管辖，由他们来引导学童精读诗歌进而研析拉丁文的基本文法。但散文的阅读赏析却是由修辞学家来主导的，所注重的是行文的风格而不是文法。与此相关，西塞罗和三个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及奥维德(Ovid, 前43—17/18)虽然在公元一世纪时已进入当时经典作家的行列之中，但到了复古运动开始的公元二世纪却被排除在外了。

发起复古运动的为首者是罗马第一位真正的校勘学家普罗布斯(Probus 约20—105)。他全盘接受了亚历山大城学者的文献整理宗旨和方法，勘定了普劳图斯、维吉尔、贺拉斯、戏剧家特伦斯(Terence, 约前195/185—前159)和卢克莱修(Lucretius, 前99—前55)等许多作家的著作校本。其校勘主要有两方面的意图：其一是努力保存作为复古运动基础的古代文学家的经典著作，并尽可能使其恢复真实原貌；其二是为这些作家作品提供易读的校本，以便于更多的读者欣赏接受，扩大其文化传播的影响。因此，他不但运用了抄本比对、异文解释和文法分析等诸多文献整理方法来校订上述校本，而且还着重依据自己研读文本的语感、逻辑和对于叙述结构的整体把握等主观体验来施行诠释。<sup>②</sup>

然而，三至六世纪期间的罗马学术趋向于围绕文选的编撰和文法的分析。就前者而言，此类的学术节录本导致当时的作家著作仅有学

术上的外貌而无真切确实的内在，即所谓“具有虚饰的学问”。尽管如此，这类文献整理还是保存了一些在其他载体中已经消失的文本资料，并且在教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塞勒斯(Nonius Marcellus, 六世纪)的《教义论节选》(*De compendiosa doctrina*)是代表作品之一。<sup>①</sup> 马丁忧私·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 五世纪)《水星与文学的婚姻》(*De nuptiis Mercurii et Philologiae*)或《七种学科论》(*De septem disciplinis*)则是经典文学方面的节录本代表。<sup>②</sup> 爱利优私·陡那图斯(Aelius Donatus, 四世纪中叶)的两部文法书《小文法》(*Ars minor*)和《大文法》(*Ars maior*)，加上普里斯安(Priscian, 六世纪中叶)的《文法基础》(*Institutiones grammaticae*)后来成为中世纪首要的文法课本。<sup>③</sup> 陡那图斯是圣杰罗姆(St. Jerome, 347—420)的老师，其所撰的《维吉尔传记》及《特伦斯》的传注仍然代表当时的纯粹学术研究。<sup>④</sup>

罗马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应是被称为古典时代的最后伟人和中世纪首位哲人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他历经了西方两个重要时代的历史转折，对于后世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中深入人心。奥古斯丁从小在北非长大，曾在迦太基(Carthage)受过良好的古典传统教育，但其

① 陆启思·缪里尔(Lucius Müller):《诺尼·马塞勒斯的教义大要:陆启思·缪里尔的修订与注释》(*Noni Marcelli Compendiosa Doctrina: Emendavit et Adnotavit Lucianus Mueller*), BiblioLife, 2009。

② 威廉·哈里斯·斯塔耳(William Harris Stahl)等:《马丁忧私·卡佩拉与七种学科》(*Martianus Capella an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二册,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1977。

③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 33页。

④ C·O·巴里克(C. O. Brink):《游斯特斯·里普斯与塔西佗文本》(*Justus Lipsius and the text of Tacitu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1(1951): 32—51页。

①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 22—23页。

② 同上, 27—29页详细介绍其校勘学的方法与贡献。

少年时在道德方面几乎可以被视为罪犯。自公元383年起,他在罗马和米兰(Milan)住了四年,担任御用的修辞学教师,似乎仕途无量前途远大;可是在386年,因受其信教之母和恩师米兰主教兼修辞学家安布罗修斯(Ambrose,约340—397)的惠泽而皈依天主教,并放弃其修辞教职回到北非,侍奉教会,当了大概六年的副主教和三十四年的主教。

奥古斯丁的著作颇丰,超过了一百部。其写作动机除了尽责去管教教徒以及替教会反驳当时异教徒的抨击之外,亦可视作其弥补少年过错的戴罪立功。他当时的写作有着深厚的拉丁经典文学功底,采取传统修辞学的结构与行文,善用经典文学引人入胜的典故,并以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主义等理论来阐述天主教的教义。他对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特别推崇,受其影响的演说也有非常高的知名度。<sup>①</sup>

但是奥古斯丁未能像他老师安布罗修斯那样掌握希腊文。其师因精通希腊文而能与东方帝国的神父保持联络,可算是罗马帝国中最后了解希腊文文学传统的学者。而奥古斯丁却受此语言和文化上的局限,而使得自己的思维模式与文学基础的建立只能依赖于罗马方面单一的遗产。《天主教百科全书》就曾因为当时罗马西方帝国丧失了对于古代希腊文知识的掌握,结果导致了天主教东西分裂日益恶化的趋势,

① 理查德·莉欧·以诺斯,罗迦·谈孙(Richard Leo Enos and Roger Thompson)编:《圣奥古斯丁的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St. Augustine*),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8; 西塞罗有关其演说的修辞学,见詹姆斯·布尔尼特·阿斯科里德(James Burnette Eskridge):《西塞罗对于奥古斯丁训练传教士演说的理论发展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Cicero upon Augusti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Oratorical theory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ator*), BiblioBazaar, 2010。

而斥责无能为力的教会学者。<sup>①</sup> 只是这一文化和宗教的发展趋势无法逆转,希腊教与拉丁教最终还是于1004年正式分裂了。<sup>②</sup>

在奥古斯丁的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部:一为十三卷的《自白》(*Confessions*),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自传。在书中,四十多岁的奥古斯丁叙述自己年轻时的不道德行为和相信摩尼教与星座学的异端以及反省忏悔并皈依天主教的过程;同时也解释了天主教关于道德、信仰和教义方面的训诲箴教。<sup>③</sup> 二为二十二卷的杰作《上帝之城抗击异教徒》(*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公元410年,罗马大城被入侵的西哥特人攻陷,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罗马帝国居民的心理。很多人将此归罪于人们离弃了以往对于传统诸神的信仰。为了安慰当时的天主教徒,奥古斯丁在该书中按照教会的历史观,着力解释了上帝的国度取代罗马的地位与形象的必然性,指出两者的更替代表着一种剧烈的抗争;被取代者代表着俗世的政权、俗世的享乐和短暂的生存;而替换者则代表着灵的境界、灵性的修养和永恒的生活。其内容包含有很多关于上帝、宇宙观、《圣经》的诠释、心理学、政治学、殉道理念、异教、犹太教、哲学批评和基督教辩论等诸多方面问题的阐发与论说。<sup>④</sup>

① 詹姆斯·洛夫林(James Loughlin)“St. Ambrose,”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07. 30 Ma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1383c.htm>>。

② 同上,“Greek Church”。

③ 勒克斯·沃尔纳(Rex Warner)译:《圣奥古斯丁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 CreateSpace, 2009; 金·帕藩罗特(Kim Paffenroth):《圣奥古斯丁告白的读者指南》(*A Reader's Companion to Augustine's Confessions*), WJK, 2003。

④ 马尔克斯·朵德斯(Marcus Dods)译:《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杰罗尔德·欧戴利(Gerard O'Daly):《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读者指南》(*Augustine's City of God: A Reader's Gui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第四章 经学过渡时期

### 一 序言

西方经学过渡时期通常指的是自中世纪的初期经学中断迄至中兴的文艺复兴的漫长过程。起初,虽然拉丁文的知识在天主教和朝廷之上持续具有其尺牍、外交、法律、教育、哲学、礼仪诸方面的众多作用;但是,纯粹为学而学的研究或文献学的整理,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算是真正恢复了正式的经学活动。其实,放眼整个中世纪,西罗马帝国的经学的确中断了;不过,在常被忽略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尽管文献极少,但经学另外几方面——目录学、诠释学等——却仍然在绵延发展着,并有不少收获。

而在中国,魏晋以后的经学,虽然直至清初才恢复到以广泛而精邃的文献学为核心的研究特色,但其间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如南北朝期间,中国经学继续发展,并依然注重礼学。南方以雷次宗(386—448)的《三礼》和皇侃(488—545)的《三礼》为代表。北方则有博通五经的徐遵明(475—529)根据西晋服虔注本《春秋》而撰写了《春秋义章》三十卷,同时传授郑玄所注《三礼》。其门生熊安生(498—578)也专以《三礼》教授,弟子多达千余人。其后,隋朝却以“义疏”为主。当时刘焯

(544—610)的《五经述义》和刘炫(约546—约613)的《尚书、毛诗、春秋、论语、孝经述义》为唐代孔颖达(574—648)的《五经正义》拓展了道路。唐朝治经除了义疏趋向之外,陆淳(?—806)的《春秋》学也很有成就。其《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和《春秋微旨》三卷,实际上开启了宋儒疑经之风。其赅续者,有刘敞(1019—1068)的《七经小传》和王安石(1021—1086)《三经新义》(书、诗、周礼)等。至于宋、元、明的道学、理学、心学,则可以归为两大类,即朱熹(1130—1200)的“道问学”派和陆九渊(1139—1192)的“尊德性”派。就文献学而言,宋、元、明虽然不发达,却未曾中断。所以,才持续了自朱熹的文献学脉络经由王应麟(1223—1296)的《困学纪闻》,演绎到焦竑(1540—1620)《焦氏笔乘正续》,再延伸到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的发展演变。

中世纪西方与中国如此的经学传统,虽相异多而相似少,但双方最终又都重视义理学。只是在中国,义理诠释的目的为德行的道学;而在西方,义理诠释却限于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即利用哲学辩论去战胜宗教上空疏理论的争论。以下仅简介几位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 二 黑暗时代

“黑暗时代”的说法是由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所创造的,指的是罗马帝国沦陷后至其所处时代之中的无拉丁文学的时期。但严格来说,“黑暗时代”现在指的是中世纪早期的时代,即公元500年至1000年。“黑暗”的意思为没有学问的光辉普照人类。之所以说当时没有经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那时的学者在修道院、学院

里利用圣经和经典文献,并采取新柏拉图寓言诠释法以及亚里士多德辩证法(Aristotelian Dialectic)来建构思想上微妙、抽象的理论。其目的不是阐释圣经或者古典文献,而是要在理论上的辩论中获胜。这种繁琐的辩证,空疏的经院哲学,缺乏灵性的神学,被视为教育与哲学之间的学术游戏。但这一时代的开端与发展趋向、思想前提导致了基督教取代诸神崇拜的宗教巨变。

堪称最后一位新柏拉图哲学家的是非基督徒辛普里丘(Simplicius, 约490—560)。他师事亚历山大城的哲学大师阿摩尼斯(Ammonius, 约440—520)和雅典哲学院的最后院长达玛祺斯(Damascius, 约458—538)。其二师皆积极注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著作,而当时的雅典哲学院实为抗拒基督教日益吞并诸神崇拜危机的文化学术基地。由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483—565)推行统一东、西帝国的政策,把基于正派基督教统一信仰的政策定为律法,实施没收异教徒和非正派基督徒财产的酷烈措施,<sup>①</sup>所以,528年此学派又惨遭了皇帝的迫害,辛普里丘与其二师等非基督徒逃至波斯避难。在那里他大概创立了一所以后延续到十世纪的新柏拉图学院。<sup>②</sup>但其返回家乡后,新柏拉图学与宗教活动分离隔开,只是前

者已经逐渐浸透了基督教的思想,走向希腊化。<sup>①</sup>

辛普里丘师承其二师的学术领域——编撰传注,曾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集,为其《物理》编撰了长达1300页的传注。但他仅以诠释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为出发点。其诠释亚里士多德的特点是采用新柏拉图注意的概念而又包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冲突。<sup>②</sup>辛普里丘虽非整理文献或分析文法的传统经学家,然而为了编写他的诸多传注,又广泛地梳理了大多现今已遗失的古代文献著作。其中的逸书包括了所谓基督教的“异端”的作家作品以及非基督教的神学论著。故此,辛普里丘现存的遗著应视为一个早期宗教思想丰富的资料库。<sup>③</sup>

而当时最能代表新学术潮流的基督教徒哲学家则为波伊提乌(Boethius, 480—524)。他生在罗马,一辈子都是一位不授徒的孤独学者和神学家,亦曾跻身东歌德(Ostrogoths)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Great, 454—526)的风毛麟角大臣之列。波伊提乌从未师从任何大师,大概随其曾在亚历山大城担任校长的父亲精通了希腊文,是当时西罗马帝国极为少见的精通希腊文者之一。他虽然未整理古典文献,却保存着其他古代学术传统。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的著作,

① 爱德华·J·瓦兹斯(Edward J. Watts):《亚历山大城里的暴乱:古代后期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社区的传统和团体动力》(Riot in Alexandria: Tradition and Group Dynamics in Late Antique Pagan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关于早期的历史背景,见亚纳尔都·莫米吉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公元四世纪的基督教与“异端”的冲突》(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大卫·侃斯坦(David Konstan)译:《辛普里丘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卷六》(Simplicius on Aristotle's Physics 6),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6页。

① 瓦尔纳·雅尔戈(Werner Jaeger):《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德育》(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耶斯·巴尔图森(Hans Baltussen):《辛普里丘的哲学与注释:一个注释家的研究方法》(Philosophy and Exegesis in Simplicius: The methodology of a commentator), Duckworth, 2008。

③ 栗色特罗·哈斗特(Ilsetraut Hadot):载于《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献中的辛普里丘生平与著作》(The life and work of Simplicius in Greek and Arabic sources)载 Richard Sorabji 编:《亚里士多德的转变》(Aristotle Transformed), Duckworth, London 1990, 275—303页。

也撰写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传注。他还立志将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解,只是此一宏业最后未能完成。尽管如此,波伊提乌依然是个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家,而不是经学家。因被奥多里克质疑他与拜占庭勾结,致使其坐牢面临酷刑。此时他撰写了《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藉以安慰自己被诬告叛国而判死刑后的濒死心态。<sup>①</sup>虽然他身为基督徒,而且也作过有关神学的论述,但他在最后时刻借鉴了经典文学的寓言和对话叙述方法,以奥德和贺拉斯的口吻进行对话,并掺杂诗歌散文写成此书。<sup>②</sup>其实,波伊提乌舍弃基督教教义而袭用古希腊哲学来安慰自己不足为怪,因为这本来是一个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后世的天主教追认他为殉道的圣人,但又认为这只是基于传说而已。<sup>③</sup>另外,他有关修辞学、文法、逻辑、音乐、天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在中世纪的教育和思想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sup>④</sup>

① P·G·瓦拉沙(P. G. Walsh)译,《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是最权威的英文译本。Loeb Classical Library 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将诗歌部分译成带有韵脚的英文。周尔·C·热里含(Joel C. Relihan):《波伊提乌的哲学慰藉》(*Boethius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Hackensack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是最有用最通顺的译本,其诗歌部分标有重音。

② 他也采用了荷马史诗的叙述结构法、古代寓言诠释法和拉丁悲剧作法。见色特·勒尔(Seth Lerer):《波伊提乌与对话:哲学慰藉的文学方法》(*Boethius and Dialogue: Literary Method i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页。

③ 威廉突尔诺(William Turner):《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2.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07. 又见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610b.htm>).

④ 就其他著作见约翰·马伦邦(John Marenbon):《波伊提乌》(*Boethi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剑桥波伊提乌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 Cambridge, 2008; 亨利·察德维克(Henry Chadwick):《波伊提乌:音乐、逻辑、神学和哲学的慰藉》(*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0.

另一杰出学人阿尔昆(Alcuin, 约 730—804)生于英国,在约城(York)修学,结业后任其母校的校长。此时的约城学院不但是英国文化的中心,也应算是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而当时法兰克(Franks)王国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大帝提倡教育的政策和支持学者的开放态度也深深吸引了阿尔昆,进而入幕成为其宗教与教育事务的智囊,晚年则至法国中部有名的托城(Tours)修道院担任了多年的院长。

阿尔昆在教育方面的功绩十分显赫。他把以前在约城所修的文科知识介绍到法兰克斯皇宫附属的学院,开创教育改革。<sup>①</sup>其教育模式主要是经由规范的正式的《三种学科》与《四种学科》,藉此将基于拉丁文学的英国教育传授给法兰克王国人民。<sup>②</sup>当时,阿尔昆这种借助于修道院的教育机关遍布了欧洲,此类修道院主要提供三种学术上的作用:

1. 提供学术空间和资源如所藏书本用于学者誊写和写作;2. 开办系统化传承知识的附属学校;3. 推动有学问的僧侣从事学问与学术交流。<sup>③</sup>

此外,阿尔昆对教育的贡献亦有更为具体的一面:他以古代所常见的对话方式撰写了文法、修辞学、逻辑等三种课本,并且编写了儿童启蒙的

① 多纳德·A·布娄格(Donald A. Bullough):《阿尔昆:成就与名誉》(*Alcuin: Achievement and Reputati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费德利茨·罗然兹(Friedrich Lorentz):《阿尔昆的生平:研究加洛林时代的国度、教会、文化上的历史》(*Alcuins Leben: Ein Beitrag Zur Staats-, Kirchen-Und Culturgeschichte Der Karolingischen Zei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2009.

② 安德鲁·傅乐明·维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阿尔昆和基督教学校的兴起》(*Alcuin and the rise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C. Scribner's Sons, 1892.

③ 阿尔巴克·迪严(Albrecht Diem):《修道院附校的诞生:阿尔昆的角色》(*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 Schools: The Role of Alcuin*), 载《约城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 Egbert Forsten Groningen 编, 1998, 27 页。

数学课本。

阿尔昆的学术著述还包括享誉学界文坛的历史、神学、哲学著作、诗歌、信札等。由于其多姿多彩的学问成就，加之力主新文艺复兴运动的门生弟子桃李满天下，应该被视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台柱人物。

### 三 加洛林文艺复兴

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指的是公元八九世纪法兰克帝国的学术与文化的复兴。加洛林(中世纪的拉丁文为 *karolingi*)本为法兰克贵族的名字，意为“查理的后裔”，即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688—741)的后裔。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盛期为查理曼和虔诚的路易(Louis the Pious, 778—840)二帝执政时期。这一文艺复兴的原动力源于虔诚基督教徒查理曼对于当时神父多数不识字甚至连圣经也不能读的忧虑，加上其发展之中的帝国缺乏识文断字的官员和文书。所以，为了普及和提高人们的语文知识，查理曼大力引进教师办学授徒。由此教育倡议，各类学科和文化如教育、神学、圣经研究、法学、建筑学、艺术、书法、文字等，也都随之繁荣起来。<sup>①</sup>

这其中书法文字的发展值得一提。当时拉丁文字的小写已经开始广泛运用，称作“加洛林小写”(Carolingian miniscule)。这种字体原本是从罗马时代的行书体演变而来的。这一演变提供了统一的文字，易

于各地神职人员、学者、书记、律师等之间的相互沟通。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以前的古代文献都重新以新的文字誊写过。其造福后代的结果是差不多所有现今有关古代经典文学的知识都是源于现存的由当时查理曼等加洛林国王的皇家誊写室(*Scriptorium*)誊写的7000多部抄本。另一种文字统一的趋向为中世纪拉丁文的规范化。此前由于长久以来语言的演变而形成了罗马语族诸多的口头方言，产生语言不通的现象。而教会、朝廷与教育界立足于保有文本文化，将此种语言上的自然演变视为拉丁文的衰败或变质，进而为了遵循古典前例和保持古今沟通的凝聚力，坚持以拉丁文为写作载体，且以阿尔昆等最佳作家作品为行文模范。中世纪拉丁文虽然增添了来自教会的礼仪和行政、法律、经济、文学等方面的新词汇，但在文法方面力主保持古典的规格。尽管在当时许多地区，中世纪拉丁文只是各地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可是由于它并没有那些母语在词汇和语法尤其是语尾变化上所深受的方言影响，所以教会、朝廷和教育界广泛运用并保持其规范化趋向，使其成为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交际工具。<sup>②</sup>

当时就纯粹学术而言，唯一堪称经学家的是法国中北部费利勒斯的鲁普斯(Lupus of Ferrieres, 约805—862)。也称鲁普斯·赛尔瓦图斯(Lupus Servatus)，是有名的修道院院长、朝廷大臣、文学家与学者。<sup>③</sup> 其师

<sup>①</sup> F·A·C·蒙特罗(F. A. C. Mantello) A·G·利戈(A. G. Rigg)编：《中世纪拉丁文：介绍与书目指南》(*Medieval Lati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ical Guide*)，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sup>②</sup> 弗兰斯·斯普罗特(Franz Sprotte)：《费利勒斯的鲁普斯·赛尔瓦图斯院长传记(1880)》(*Biographie Des Abtes Servatus Lupus Von Ferrieres (1880)*)，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9 重印。

<sup>③</sup> 关于艺术、书法、建筑等，见詹·胡巴特(Jean Hubert)：《加洛林的文艺复兴》(*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G. Braziller, 1970；关于学术和文字的发展，见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92—109页。

亚尔德利克(Aldric, 约 800—856)幼时在查理曼的朝廷里长大,后成为主教。鲁普斯跟随他在以后担任院长的费利勒斯修道院里修习《圣经学科》与《四种学科》。尽管他对此类课程通识很冷淡,但热爱古典文学。约在 830—836 年间,鲁普斯在现属德国的佛尔达(Fulda)修道院跟从享有“德国第一大师”之誉的拉巴纳斯(Rabanus, 约 780—856)研究神学,也与当地识字好学的修道院长和神父交往,并由此开始了他的生主要从事的借书誊写抄本的学术活动。他修习饱学返乡后不久,就出任了费利勒斯修道院院长。此时,他受到当时皇帝和教主的器重,曾担任朝廷的钦差大臣,也代表教会出差办事。虽然当时鲁普斯扶助民众和保护修道院都颇有功绩。但最令人注目的还是他所贡献的文学与经学遗产。

如,鲁普斯身为当时有名的修道院长和文人,常与包括各地修道院长和教会的学者通信,其所现存的一百三十多篇信札均表现出了文采雅致的风格和精于把握历史细节的特色。<sup>①</sup>他也常接受委托,撰写著名的修道院长的传记或神学的教义论说。但他最为挚爱的还是对于经典文学抄本的收藏与整理,并因此与众不同,而成为当时大概是唯一的文献学家。<sup>②</sup>鲁普斯这些广泛收集抄本的活动不但要补足其修道院所缺

之书,也注意寻觅已收藏抄本的其他誊写本以便于校对。<sup>①</sup>目前现存的经过他亲手誊写或校对的经典抄本就已达到十二篇之多。<sup>②</sup>也正是由于鲁普斯这种倾心于文献学的热情与成就,他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先锋或中世纪早期人文主义第一人。

#### 四 拜占庭

拜占庭帝国其实是罗马帝国的后续,与其前身似无明显的区分。它正式发端于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 272—337)迁都至其重建的拜占庭城,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城。从文化发展史来看,罗马帝国时期西方的“黑暗时代”与东方拜占庭在学术上最大的分别之一是前者的师承关系不明,而后者的源流则很清楚。前者的学术脉络难以理清,不但是因为其师承关系仅限于“一而再”而不能“再而三”的文化传播,也缺乏相关历史资料方面的实证记载;而且当时的学术、经济情况亦不允许其师承关系的持续性发展。黑暗时代那些由修道院、大会堂、朝廷学院所掌控的教育、学术中心就好比在文盲(不识字)的汪洋大海里的文化(识字)的小孤岛。当时至多只能说是仅有个别学者在从事教育或哲学方面的阅读、诠释、翻译和注解。但这极少数人的学术成就却是以师承的方式进行教育、哲学等方面的阅读研习,因

① 格雷顿·W·雷格诺斯(Graydon W. Regnos):《鲁普斯·赛尔瓦图斯信札》(The Letters of Lupus Servatus), Martinus Nijoff, 1966; 彼得·K·马尔沙(Peter K. Marshall):《鲁普斯·赛尔瓦图斯信札》(Servati Lupi Epistulae), Teubner, 1984。

② 罗伯特·J·格莱佩(Robert J. Gariepy):《费利勒斯的鲁普斯与经典文学》(Lupus of Ferrieres and the Classics), Monographic Press, 1967, 36—81 页研究其引用古典作家的方法, 86—101 页分析他的校勘工作。格莱佩氏的结论是其文献学,他收集誊写抄本和校勘学最佳,但阅读古典作家的视野稍窄,来自第二手的引文较多。

① 有关他征求抄本的信,见查理斯·亨利·币孙(Charles Henry Beeson):《身为抄写员和校勘学家的费利勒斯的鲁普斯》(Lupus of Ferrieres As Scribe and Text Critic),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0, 3 页。此书复印了鲁普斯整理西塞罗《演讲论》的抄本,内有其训诂和校勘符号。

② L·D·雷诺多斯及 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 104 页。

而也造就了一些经学方面的创新业绩。

当时一位早期杰出的哲学家与注释家是普罗克洛斯(Proclus, 412—485),也可以算是经典时代最后的新柏拉图大哲学家之一。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为了效法其父要当法官,而赴亚历山大城学修辞学、哲学和数学,修业未完就回到家乡做了律师。但他后来发现此业无味,返回亚历山大城潜心于哲学,又因不满哲学教学,再次半途退学,进入雅典历史悠久的学院研修哲学。其后,他除了迟暮出游一年,以避免政治上的威胁外,毕生都住在雅典担任学院院长,授徒写作。其著作多是为荷马、赫西奥德、柏拉图等人著作所作的注释。

普罗克洛斯作为基督徒,认为柏拉图是感受了上帝的灵感而写出其哲学妙言,所以他对柏拉图的诠释以寓言诠释为出发点,企望梳理其微言大义。<sup>①</sup>他除了诠释注解之外,还撰写了哲学、神学、数学方面的论说。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基督徒哲学家的普罗克鲁斯亦欣赏经典希腊史诗家荷马与赫西奥德,与当时西方仅限于拉丁文的神学家大相径庭。他的哲学与神学对中世纪思想的影响极大。例如,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中就采纳他很多的立场观点,其他不少作家亦暗中借用他的学说。只是后世读者并不知道这些学说原本是他的思想结晶,所以,尽管他的贡献不小,但名声不大。<sup>②</sup>

还有两位差不多同时代亦同名为普罗柯比(Procopius)的士人,则

体现出当时经典文学与教会神学之间的差别。其中凯撒利亚(Caesarea)的普罗柯比(500—565),曾受过传统的希腊文和修辞学以及法律方面的拉丁文的教育。他年轻时当上了一位将军的法律顾问,随其出征,因目睹多年的战事,编撰了皇帝的战争史和野史。<sup>①</sup>他采纳的古文行文被叫作“阿提卡主义”(Atticism)。“阿提卡”即雅典附近的地区,“阿提卡主义”的意思为力图效法古代雅典所用的语言。拜占庭一直以贯之的非教会的历史、文学、外交、政治方面的散文,均依循古代雅典标准的风格与词语,连内部的公文也无例外,好比唐朝的大臣禀告外患时总把突厥惯称为“匈奴”一样。这一“阿提卡主义”的文风贯穿了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发展历史。当时在文学教育方面,拜占庭亦采取科举制,考题为古希腊文学的内容,所用“八股文”,即“阿提卡主义”。其执意传承的古文运动虽然导致了以后对于白话文写作的忽略,但又因推行了一些小学方面的学风和举措如编辑古文词汇表等,却又为人们的写作提供了便利。<sup>②</sup>

另一位叫作普罗柯比的是加沙(Gaza)的普罗柯比(约465—528),是一位诡辩家与神学家,毕生都居住在家乡。其神学论说和有关圣经书卷的注释很多。他的行文受到了后世的批评。但主要不是因为他学习古风,而是由于所用语言层次太高,绮靡曼辞过于华美雕琢。拜占庭

① 《柏拉图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lato): 托马斯·泰来(Thomas Taylor)译, Prometheus Trust, 1995。

② 罗兰斯·J·柔三(Laurence J. Rosan):《普罗克鲁斯的哲学:古代思想的最后阶段》(The Philosophy of Proclus: The Final Phase of Ancient Thought), Prometheus Trust, 2008。

① 安顿尼·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古代后期的苛政,历史与哲学》(Procopius of Caesarea: Tyrann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② 关于拜占庭的悠久的“阿提卡主义”散文作风,见N·G·威尔逊(N. G. Wilson):《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4—8页。

以后的散文写作趋向都沿着这两位普罗柯比的行文轨道,即“阿提卡主义”和文辞浮华主义。不过,加沙的普罗柯比对学术亦有所贡献,创造了一种新的“集注(catena)”式的传注体,把关于圣经书卷的各种注释刊集中汇聚,排列出最佳的训诂或诠释。<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位普罗柯比同时也代表了六世纪文学与学术的衰落,即拉丁文的最终消失。这是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一位稍微了解拉丁文,而且也只是学习过一些法学方面专用的拉丁文。六世纪拉丁文的普及教育还是日益衰落,到了世纪末,在君士坦丁堡,拉丁文知识就已经几乎不存在了。<sup>②</sup>从此以后,拜占庭的经学、文法、语言学、教育、哲学、神学和书目学等学科都只用希腊文,而不再涉及拉丁文了。

拜占庭亦经过其所谓的“黑暗时期”,时间约在641年至800年期间,始于赫拉克留皇帝(Heraclius, 610—641 执政)之死。赫拉克留皇帝曾弃用拉丁文的公文写作而以希腊文取代,但在黑暗时期,希腊经典文学的教育又走向低潮。不过,641年之所以开始进入黑暗时期,也是由于在赫拉克留皇帝当政之时就遭遇到伊斯兰教武力的广泛扩张,地中海上的贸易被封锁,以致大大影响拜占庭的国际经济与文化的地位。

虽然如此,当时的拜占庭也对世界学术作出了两大贡献:其一,拜占庭开始广泛以纸作书,取代了以往的羊皮写卷。其二,与上述拉丁文文字的演变一样,拜占庭将往昔希腊文字大写字体(uncial)衍生出小写

① 阿拉尹·沙窝特(Alain Chauvot):《加沙的普罗柯比,凯撒利亚的普里锡恩,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颂词》(Procope de Gaza, Priscien de Cesaree, Panegyriques de l'empereur Anastase Ier), Habelt, 1986。

②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58—59页。

体(miniscule),此转换节省了书页上的篇幅,使经与传都能写在同一书页上。<sup>①</sup>这种将个别单行的传注文改为写在页边的训诂式释文的变革,可能是这一时代在经学上唯一的重大贡献。<sup>②</sup>

拜占庭黑暗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神学上的争议,其焦点为是否应该展示与宗教主体尤其是与耶稣和圣人有关的画像和雕刻,即所谓的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这一运动约在730年由皇帝利奥(Leo III, 685—741)正式发布开始,一直持续到教会恢复原来政策的843年。其学术上的副作用之一是形成了鉴定文献的必要性:因为参与争议的各方所拿出辩解论证的古抄本、公文和信札等,都必须经过鉴定才得以明了其真伪虚实。

圣像破坏运动末期出现的最杰出学者大概是哲学家利奥(Leo the Philosopher, 约790—869)。他生于希腊塞萨利(Thessaly),后迁至君士坦丁堡就学,当过塾师,因精通哲学、文学、文献学、逻辑、医学、天文学、占星和数学等,被称为通学的“文艺复兴人物”。当时他虽然身为圣像破坏运动的都市主教,但在此运动结束后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不大,解职后又任修道院长。其现存的唯一文献中仅有关于柏拉图抄本的注释,但仍能证明其志于注解与校勘的兴趣在当时是极罕见的。<sup>③</sup>

圣像破坏运动之后的第一大学者应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获提忧思(Photius, 810—893)。他出生于为教会服务的拜占庭大家族之中,涉猎极广,藏书很多,喜好以文会友,其博学强记可谓学术界魁首,曾被

① 关于这两大学术贡献,见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63—68页。

②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52页。

③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79—84页。

誉为“拜占庭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sup>①</sup>他师事何人史无明证,很可能是无师自通,只是因为他通识博学极为精深广大,令人难以置信是其成就的。所以,现今有学者断言“其治学天资非凡,勤奋超人”(his natural aptitude must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his industry was colossal)。<sup>②</sup>然而,获提忧思始终没有成为一位纯粹的学者,而是着意为官为僧。他曾官至宰相和太傅,后因政治需要,与其他大臣暗中勾结,谋取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之位;七年之后,遭到弹劾而被流放七年;此后又恢复了主教的职位,但过了八年再次被新即位的拜占庭皇帝废黜。由于他积极支持反罗马的政治派别,制造了与罗马天主教的隔阂,最终导致了持续到今日的天主教会大分裂。依照天主教的历史诠释,获提忧思实为这一大分裂的罪魁祸首。<sup>③</sup>

虽然获提忧思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中世纪最有学问的人物,但他与其时代的通病一样,不是一位很有创意的学者。他的著作很多,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神学论说、多达近两百篇的信札、圣经的注释、问答体的教会法

律的《汇典与正确阐释》(*Eunagolai kai apodeixeis akribeis*)、讲道的演讲、问答体的《给安费罗季亚》(*Amphilochia*)以及献给其门生的关于圣经和其他宗教上的问题的解答。只是这些著书立说,主要依赖于其非凡的勤学毅力、广泛阅读和博闻强记,而不是源于探寻深邃抽象理论的精辟思维。

在经学方面,获提忧思的贡献在于两部杰作。他的第一部杰作是长达1,600页280卷(280条目)的《读书札记》(*Bibliotheca*)。获提忧思把一生的读书心得体会都记载在其中。该书曾被评为可能是拜占庭文学史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内有很多他处难觅的逸书节录文献。<sup>①</sup>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条札记援引如下:

(1) 读了约翰·费罗盘努斯(John Philoponus, 六世纪初叶)《复活论》的论说,……卷。此论说有关抛弃身体的复活的教义,他判断它为愚蠢。他亦嘲笑有福气和神圣的神父。(第二十一条)<sup>②</sup>

(2) 读了第一届会议(尼西亚)的行传,三册。它带有格拉斯尤斯(Gelasius)的名字,但不是行传体而是历史体。虽然作者的行文卑下,然其关于会议的细节丰富。(第十五条)<sup>③</sup>

(3) 读了上文提及的作者(狄奥尼修斯的哈利卡那苏斯 Dionysius

①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88页。有关其生平与经学上的诸多贡献,见88—119页。最详尽的分析为1867年德国的约色福·和根罗特尔(Josef Hergenröther)所著:《获提忧思-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生平、著作与和希腊教会的分裂》(*Photius, Patriarch von Konstantinople: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6重印。

② 亚迪安·佛尔特库(Adrian Fortescue):《君士坦丁堡的获提忧思》(*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2.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1. 16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2043b.htm>>.

③ 亚迪安·佛尔特库(Adrian Fortescue):《东方的分裂》(*The Eastern Sch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3.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16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535a.htm>>; 弗兰克斯·德沃尼克(Francis Dvornik):《获提忧思的分裂》(*The Photian Sch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1970重印,第四、七章。

①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93页。从93到111页N·G·威尔孙详细分析了此书和作者的学术优、缺点。亦见拉鲁·凡·胡克(Larue Van Hook):《获提忧思读书札记中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Bibliotheca of Photius*), Union of Chicago Press, 1909。

② J·H·傅莉斯(J. H. Freese):《获提忧思读书札记》(第一卷) (*The Library of Photius, Volume 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25页。亦见瓦伦·T·特勒歌德(Warren T. Treadgold):《获提忧思读书札记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Bibliotheca of Photiu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0。

③ J·H·傅莉斯(J. H. Freese):《获提忧思读书札记》(第一卷) (*The Library of Photius, Volume 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23页。

of Halicarnassus, 约公元前 60—7 年后)的《历史》(*Histories*), 三卷的《简介》(*Synopsis*), 五卷。虽然后作的行文较为文雅, 没有前作那么顺, 但后作仍然由于含有至要的核心内容而更为宝贵。从其言简意赅的风格来看, 作者应该被视为立法的国王: 他的文章和措词都发出了一种刺耳的声音。他的叙述方式不是不适合简介的写作, 而是不适合写作完美和完整的历史。作者明明生活在编撰罗马历史的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 约 150—235)和亚历山大的阿丕安(Appian of Alexandria, 约 95—165)之前。(第八十四条)<sup>①</sup>

茯提忧思此书里很多札记的篇幅相当大。譬如说, 关于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的札记英文翻译长达九页, 关于亚历山大城的乔治(George of Alexandria)的札记长达十页, 关于奥林批忧多罗斯达(Olympiodorus, 公元五世纪初叶盛行)的札记有十四页, 而关于斯特西忧思(Ctesias, 约公元前五世纪盛行)两部历史书的札记有两条, 一共十九页(内容很详细, 包括文化与民族风俗)。

茯提忧思第二部杰作是《词汇表》(*Lexicon*)。其关涉的词汇多为“阿提卡主义”的措辞、匠人的专有名词和基督教的生词等。<sup>②</sup> 以往旧说曾称此书的编写是他根据早期词书依靠其门生来完成的, 但现今专家 N·G·威尔孙则断言纯系茯提忧思年轻时独自一人所为。<sup>③</sup>

① J·H·傅莉斯(J. H. Freese):《茯提忧思读书札记》(第一卷)(*The Library of Photius, Volume 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151 页。

② 理查德·瑞兹恩特尹(Richard Reitzenstein):《茯提忧思词汇表的泉源》(*Der anfang des Lexikons des Photio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1907。

③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 90 页。就英文译本见 N·G·威尔孙:《茯提忧思读书札记(选集)》(*Photius: The Bibliotheca (Selected Works)*), Duckworth Publishing, 1994。

拜占庭时代类似《读书札记》的重要巨作还有《苏达》(*Suda*, *Suda*, 涵义大概为“堡垒”), 是十世纪所编的字典和百科全书。虽其作者不明, 但所写的历史和文学的分析条目应该是从往昔的辞书编写演变而来的。该书按照字母编排, 有 2,785 页, 30,000 多条。这些条目先分析某字、某词的词源, 揭示其在文字或词汇本源上的原貌, 再由此去发挥其文法、历史或文学方面的用法和意义。其中有 5,000 条目是关于古代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曲目中剧本的引文、生词和训诂的。同样, 与荷马有关的条目亦很多。<sup>①</sup> 其实, 以百科全书的特质也就是从这种词源的阐发而衍生出来的。比如, 此书就引用了上述希腊同化时代亚历山大城经学家的两三则传记条目。<sup>②</sup>

如果说茯提忧思应被评为中世纪最有学问的人物, 那么迈克尔·瑟勒斯(Michael Psellos, 1018—1078/1096)则应被视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作为权威的文学家、通学博识的演讲者和官学最高学府的哲学教授, 与其门生统领了十一世纪拜占庭的学术发展。迈克尔·瑟勒斯生于君士坦丁堡, 幼年因精通荷马史诗而获得“神童”之誉。他从书记的小官开始, 其人生轨道就未脱离过朝廷的政治生活, 盛时成为皇帝的智囊。虽然, 他当时有关的哲学演讲和论述向学术界重新介绍

①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 146 页。

② 亚当·道布(Adam Daub):《搜达传记的研究》(*Studien Zu Den Biographika Des Suidas*), Nabu Press, 2010。网络上的《苏达》最方便查阅; 其网址为 <http://www.stoa.org>。

了古代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与新柏拉图主义,<sup>①</sup>但以现代学术意识来观照,称之为历史学家更为切实。其唯一杰作《本纪》(*Chronographia*)记载了近百年十四个皇帝、皇后的统治,因作者附加了很多内幕细节,读起来好似一本个人回忆录。<sup>②</sup>有人认为瑟勒斯利用历史叙述体而掩盖了其对于政治与宗教带有革命性的哲学出发点。<sup>③</sup>还有人推测他的历史著作不仅含有巧妙批评历代皇帝的讽刺语气,而且也以此来辩白自己的弱点和巩固自己的立场。<sup>④</sup>尽管其他一些论作证明他为博学的散文家、神学家和演讲家,学术范围极其广泛,可是并没有其他的成果能与《本纪》相媲美。当然因其遗著大多尚未出版,所以现代学者对他的评估也未必公允。<sup>⑤</sup>

就经学而言,迈克尔·瑟勒斯有关荷马的解释是以基督教化的

- ① 安顿尼·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拜占庭的希腊同化:希腊的统一性与传统的接受》(*Hellenism in Byzantium: The Transformations of Greek Identity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1—224页;约翰·杜费(John Duffy):《拜占庭的希腊同化期哲学和迈克尔·瑟勒斯的单一使命》(*Hellenic Philosophy in Byzantium and the Lonely Mission of Michael Psellos*),载《拜占庭哲学及其古代渊源》(*Byzantine Philosophy and Its Ancient Sources*), Katerina Ierodiakonou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9—156页。
- ② E·R·A·苏特尔(E. R. A. Sewter):《拜占庭十四位统治者:迈克尔·瑟勒斯的本纪》(*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he Chronographia of Michael Psellus*), Penguin Classics, 1979。
- ③ 安顿尼·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瑟勒斯本纪的叙述论》(*The Argument of Psellos' Chronographia*), Brill, 1999。
- ④ 娥费米娅·皮茨(Efthymia Pietsch):《迈克尔·瑟勒斯的本纪:皇帝历史、自传与辩解》(*Die "Chronographia" des Michael Psellos: Kaisergeschichte, Autobiographie und Apologie*), Reichert, 2005。
- ⑤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156—179页,介绍其生平后便根据其现存易找到的著详细分析其对于经典与基督教作家的诠释态度。

言诠释为主的。其寓言诠释与希腊同化时期的理智化的寓言诠释有所区别,兹举以下两例为证:

其一是《伊利亚特》卷4的头四行诗句:

众神坐在宙斯旁边,在黄金地上  
召开大会,尊贵的赫柏给他们斟神液,  
他们遥遥望着特洛伊人的都城,  
高举金杯互祝健康,彼此问候。<sup>①</sup>

迈克尔·瑟勒斯曾自许其诠释旨在将古代希腊的假神话改为基督教的真理,故释“宙斯”(Zeus)这一名称为 *zoë*, 即希腊文“生命”的意思,意指古代的大神寓言“生命粮”的耶稣。他还将坐在宙斯旁边的诸神释为下凡保护基督徒的天使们,并以“特洛伊乃比喻蔑视学术上美好事物的俗世国度”。很显然,瑟勒斯的这种诠释法表明他是将小学的训诂方法和新柏拉图与基督教的寓言诠释法混杂在一起的。<sup>②</sup>

其二是《奥德赛》卷10的第310—320行诗句:

我在美发女神的家门站临,  
站着叫喊,神女其时聆听,  
当即打开闪亮的房门出来,邀我  
进去,我随之入内,心里忧烦至极。

① 罗念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85页。

②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162页。

她让我下坐靠椅,绚美,嵌缀银钉,  
做工精致,其下有一张足凳垫底。  
她给我一份饮料喝饮,兑调在一只金杯里,  
拌入魔药,怀藏歹毒的用心。  
她递出此物,我接过喝尽,未曾中魔变形,  
她举杖击我,开口对我说及:

“去往你的圈栏,和你的朋伴躺在一起。”<sup>①</sup>

瑟勒斯在此诠释中,把女神企图将奥德赛及其伙伴变为猪的有名插曲释为基督教的道德训诫:女神虽为娱乐,但她奉敬的仙丹却是罪孽,所以这一故事在瑟勒斯的寓言诠释视野里就整个改造成了在娱乐诱惑之前屈服的事迹。<sup>②</sup>

而十二世纪拜占庭最杰出诗人应为约翰·责兹(John Tzetzes,约1110—1180)。他也是文法家和注释家。其诞生地和早年就学经验现无历史记载。他当了文官后因丑闻而被免官,处境穷困,只得不断变卖其宝贵的藏书。可能因此他著书立说难以查阅众多图书而只能依靠记忆,以致其学术著作常出小错。他一生都在皇帝或贵族大家族的庇护之下担任老师,虽然为人暴躁,难以相处,但又确实是当时的博学之士,通晓多种外文。他作为诗人,曾写过一篇史诗以承续《伊利亚特》收结之后的故事。他的12卷的杰作《历史书》(*Book of History*),采用诗歌形式来注释其写给古今闻人的107封信札里诸多的历史与文化典故。

① 陈中梅译:《奥德赛》(*Odyssey*),303—304页。

②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162页。

其《历史书》的价值在于保存了众多早已失传的逸书的节录或引文文献资料,所涉及的作家多达400位。

约翰·责兹曾说写作了约60本书,可谓著述等身。他还撰写了很多关于古代希腊诗人的专注,包括荷马、赫西奥德、品达、多位悲剧家以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其有关荷马的诠释当然也采用的是寓言诠释。如其《伊利亚特的寓言》(*Allegoriae Iliadis*)就用了三种寓言:历史寓言,即诸神和英雄原来是凡人;心理寓言,即诸神代表感情或意识能力;具体(physical)寓言,即以诸神代表自然的势力来诠释最伟大的史诗家。<sup>①</sup>德国新希腊学时期曾将瑟勒斯和责兹两学者关于荷马《伊利亚特》的寓言诠释一并发表。<sup>②</sup>

最后还要介绍的是被N·G·威尔孙称为现今知名度最高而且学术著作最多的拜占庭学者优斯塔提斯(Eustathius,约1115—1195)。其最显赫之处可能在于:因从事经学各领域内文献学和校勘学的纯粹研究而被视为拜占庭最有权威的经学家。优斯塔提斯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年轻时当过文官,后担任塞萨洛尼基的大主教和京师的哲学教授,作过神学方面的论说与演讲。<sup>③</sup>1185年诺曼人攻下塞萨洛尼基城时,他目睹了当时水深火热、断壁残垣的惨事,而编撰了历史杰作《塞萨洛尼基城的劫难》(*The*

① 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193页。此书190—196页分析他的各种著作。

② 约翰·责兹和迈克尔·瑟勒斯(John Tzetze and Michael Psellos):《责兹与瑟勒斯德伊利亚特德寓言诠释……》(*Tetzae allegoriae Iliadis accedunt Pselli allegoriae...*),1851; Georg Olms Verlagsbuchhandlung, 1967重印。

③ 彼得·威尔特(Peter Wirth):《优斯塔提斯:关于萨洛尼基大主教优斯塔提斯生平与著作的全文》(*Eustathiana: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Leben und Werk des Metropolitens Eustathios von Thessalonike*), Adolf M. Hakkert, 1980。亦见N·G·威尔孙:《拜占庭的学者》,196—204页。

Sack of Thessalonica)。他还为诗人品达、阿里斯托芬和用诗句来写作的地理学家狄奥尼斯·帕莉哥特斯(Dionysius Periegetes, 盛年约在公元前二或三世纪)等撰写传注。其中有必要简析的当然是他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所作的传注。

优斯塔提斯有关荷马传注的第一个特点是繁杂琐碎、累赘絮叨。如他为《伊利亚特》第一行诗句所写的传文就有十页之多, 整个《伊利亚特》的传注长达1400页, 《奥德赛》的传文虽短一些, 但也将近800页。如此繁芜的释文正类似《汉书·艺文志》所载“说五字之文, 至于二三万言”之谓也。只是由于优斯塔提斯作传注的目的在于书童的启蒙, 所以文艺复兴的学者并不以为此类繁琐著作是反常的奇事。其传注的第二个特点是缺乏创意。优斯塔提斯大炒早期诸多注释家的冷饭, 并掺杂了训诂、文法、诠释和道德教训等释文。其中包含了极多诸如希腊同化时期大经学家逸书的引文, 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不过, N·G·威尔孙对于优斯塔提斯的判断力和学术能力的评价相当消极。固然优斯塔提斯难以达到希腊同化时期职业化经学家的标准, 更不及文艺复兴以来的文献学家, 然而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 却几乎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在当时以神学和神学化的哲学诠释为主的学术环境里, 经典诗人的整理和传授, 除了用于初等教育的狭窄范

① L·D·雷诺多斯及N·G·威尔孙:《文书与学者》, 71页。约翰·哥特费·瑟尔包(Johann Gottfried Stallbaum, 1793—1861)编辑的《萨洛尼基大主教优斯塔提斯有关荷马〈伊利亚特〉的传注》(Eustathii Archiepiscopi Thessalonicensis Commentarii ad Homeri Iliadem)和《萨洛尼基大主教优斯塔提斯有关荷马〈奥德赛〉的传注》(Eustathii Archiepiscopi Thessalonicensis Commentarii ad Homeri Odysseam) 1825—1826出版, 最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重印, 全四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围外, 并无更为切要的作用。而优斯塔提斯已能注意到非教会文学的校勘整理和诠释, 就理应看作是他独到的成就。

## 五 经院哲学

### 1 背景

经院哲学为中世纪1100—1500年间欧洲的学术运动, 其特点为学习方法而不是学术内容。虽然其渊源于黑暗时期基督教化的哲学思想, 但其盛期约在1200—1300年。其最终目的为包容古典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主要流行在附属基督教大教堂的学院, 所以经院哲学的西文名字“scholasticism”意思为“属于学院的学问”。

经院哲学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为辩证论, 即提出问题后通过辩论来化解内在矛盾, 以理智与逻辑去战胜实际证据的分析。曾有一位现代西方汉学家在比较中国宋代道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后, 指出中西各种经院哲学传统(包括犹太教和回教)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法定的经典(canon)已经神化(sacralized); (2)经典已脱离其历史环境而被断章取义了(decontextualized historically); (3)传注体成为经院哲学首要的学术载体; (4)经典注释的出发点远离历史解释而针对经典的完整性(integrity)、一贯性(consistency)、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和简洁性(compactness)。<sup>①</sup>

① 约翰·B·恒德孙(John B. Henderson):《新儒家的经院哲学》(Neo-Confucian Scholasticism), 载《经院哲学: 跨文化和比较的观点》(Scholasticism: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osé Ignacio Cabezón 编,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161页。

简而言之,早期的欧洲经院哲学分为两种意识出发点:一是以信仰为中心的神秘主义;一是以思考为中心的唯理论。而略微细致一些地说,当时的教会在包容了两种经院哲学学派的内在冲突之时,亦呈现出它们分别代表方济各会(Franciscans)和本笃会(Benedictines)这两种修道院里不同生活组织在哲学发展趋向上的区别。前者以奥古斯丁的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为主,加之亚里士多德玄妙的一面,主张寻求真理依靠理智和信心。<sup>①</sup> 主要代表为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等。后者则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主,依靠纯粹理智去寻求真理。但其最杰出的学者不是本笃会成员而是多明我会(Dominican)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 2 代表性神学家

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 1079—1142)是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他幼年起学习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辩证论,后又走遍法国研修辩论,自称是亚里士多德的私淑弟子。他亦曾去巴黎学习,建立私塾,潜心神学,于1115年坐上巴黎大教堂的神学席位。其有关神学的演讲极受欢迎,听众蜂拥而来,后因与女门生埃洛伊兹(Heloise, 约1101—1164)萌生私情、暗中成婚一事被人揭露而革职,并惨遭该女伯父的阉割。他的《遭难记》(*Historia calamitatum*)就真切地叙述了这一

悲惨经历。<sup>①</sup> 此后阿贝拉尔出家进入修道院,但其缘由不是出之对于基督教的虔诚,而是因为他所受到的人生屈辱。<sup>②</sup> 与此相关,他在晚年隐居写作授课之时,又始终与后成为女隐修会长的埃洛伊兹保持通信。<sup>③</sup>

阿贝拉尔对当时哲学的影响极为重要。他基本上确立了神学的定位,即让当时的神学辩论采用理智的推理和逻辑的分析来解释教会的教义,而再也不必单靠信心去接受神父的猜测。一位近代学者曾分析此点如下:“阿贝拉尔将理智与哲学视为神学上有有效的工具,这是因为它们是上帝所赐给的……他重新强调用理智来了解信心和说服别人关于基督教的真理的价值。阿贝拉尔常引奥古斯丁来支持他利用理智的立场,因为奥古斯丁亦用理智研读经文和判断正派与邪教。但阿贝拉尔的辩证方法确用为激发思考、培养学生质问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决定事实。他旨在引导学生寻求真理。”<sup>④</sup> 即使他对教义的诠释被当时的神学家所拒绝,可是一百年后他的异端已经被视为正派了。当亚里士多德的《工具》(*Organon*, 六种逻辑著作的合称)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学堂里时,阿贝拉尔也通过写作逻辑学最重要的著作《逻辑学初阶》(*Logica ingredientibus*),来推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并从此逐渐取代了柏拉图的哲学系统。除去辩证论以外,他的神学和伦理学亦影响了当时

① 亨利·亚当·倍罗斯(Henry Adams Bellows)译、罗夫·亚当·克拉玛(Ralph Adams Cram)介绍:《遭难记:彼得·阿贝拉尔的自传》(*The Story of My Misfortunes; The Autobiography of Peter Abelard*), The Free Press, 1958。

② 同上,32页。

③ 关于他们的关系,见康斯坦·缪丝(Constant Mews):《阿贝拉尔与埃洛伊兹》(*Abelard and Helo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贝提·拉蒂斯(Betty Radice):《阿贝拉尔和埃洛伊兹的信札》(*Th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 Penguin Books, 1974。

④ 卡特连·M·斯塔尔斯(Kathleen M. Starnes):《彼得·阿贝拉尔的历史地位》(*Peter Abelard: His Place in Hi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104页。

① 威廉·突尔诺 William Turner:《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3,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30 Apr.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548a.htm>>。

的哲学界。他在《一切善的神学》(*Theologia summi boni*)里论述自己主要的神学贡献,而《明心见性》(*Scito te ipsum*)则载有他关于伦理学的主要论说。

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约1265—1308),生于苏格兰,因此无大学,所以又迁至牛津学习。他的就学过程如同当时一般学童,先到十二岁先修预科的《三种学科》和《四种学科》,再花六年时间学习神学论,其后三年研习辩论,第十年开始准备有关神学论的基本课本——彼得·伦巴(Peter Lombard, 1100—1160)的《句子,四书》(*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的演讲,第十一年则教授与此相关的课程,第十二年则要作关于神学的演讲,而最后一年还须与不同的大师作辩论实习。<sup>①</sup>这样到了26岁,他就成了教会的祭司,开始在巴黎大学演讲,晚年又去科隆的方济各会学院教学直至去世。在哲学领域,他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有独到的论说;<sup>②</sup>而其神学又力图证明信仰的教条或者否定异端,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依靠教会的权威,而且运用理智与逻辑来认同或者反驳之。<sup>③</sup>

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约1288—1348)曾在牛津大学修学硕士,但未完成其学业。他因强于逻辑,被连累进与教士辩论的案件,但企图用辩证逻辑帮助左道旁门的方济各会神父被告失败,而被迫

于1328年出逃避难,并遭教会开除。该年应视为奥卡姆学术研究的分水岭。其出逃前注重哲学的研究,包括神学论、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等,<sup>①</sup>而出走后的写作则关注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权利,提倡方济各会的无财立场与当地政权的独立。<sup>②</sup>奥卡姆经院哲学方面的论说着重于将内容与学习方法简单化,因提倡“简单的解说为佳”而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Ockham's) Razor)。他有关逻辑的首要论著为一本1323年完成的课本《逻辑大全》(*Summa logicae*),共有三册283卷。他为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著作写的传注,原本是方济各会修道院的演讲讲词,其中介绍了唯名论。

上述后两位具有很大学术影响的神父均为当时方济各会会员。这里还要介绍的却是笃明我会的会员——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他曾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思想界影响最大之人物<sup>③</sup>,在天主教神学和哲学上的深远影响只有朱熹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能与之比肩。只是朱熹的诠释框架一部分是基于文献学的研究基础,阿奎那的思想与辩证法却完全凭自己的思维而构成的,毫无涉及

① 多马·威廉(Thomas Williams)编:《剑桥邓斯·司各脱的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ns Sco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页。

② 安屯尼·沃斯(Antonie Vos):《约翰·邓斯·司各脱的哲学思想》(*The Philosophy of John Duns Scotu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威廉·A·弗兰克(William A. Frank)、雅伦·B·沃尔特(Allan B. Wolter):《形而上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 Metaphysician*), Purdue University, 1995。

① 史多分·查克·透尔内(Stephen Chak Tornay):《奥卡姆:研究与文选》(*Ockham: Studies and Selections*),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38, 初步介绍其唯名论、自然、伦理、政治等哲学思想。有关其哲学研究的其他领域,见保罗·文森·斯帕德编(Paul Vincent Spade)编:《奥卡姆的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ckh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格登·勒夫(Gordon Leff):《奥卡姆的威廉:神学论说的演变》(*William of Ockham: The Metamorphosis of Scholastic Discours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5, xvii页。此书主要分析奥卡姆出走前的神学与哲学思想。

③ 但以尔甘乃迪(Daniel Kennedy):《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7 May, 2010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4663b.htm>>。

文本上的研究。在此他较为像陆九渊唯心主义的心学。

阿奎那生在意大利南部的贵族家庭,五岁起就学于蒙特卡西诺(本笃会),后因战乱转学到拿波里,受到多明我会讲道者的影响,十九岁立志入会。但其母却期求他加入本笃会,甚至把他困在家里两年,被释放后才得以参加多明我会。1245年多明我会派阿奎那去巴黎大学修神学,1248年他又随其授业的神学大师赴科隆研修和演讲,1252年再回巴黎攻读神学硕士。当时他先把《句子》(即彼德·伦巴的《句子,四书》)的学士学位修毕,再用三年时间专治《句子,四书》。1256年他被确立为巴黎大学的神学大师,三年后开始去外地多明我会学校讲学;1265年至1272年在罗马、巴黎和拿波里等地辗转建校、授课,1274年逝于在旅途之中。五十年后阿奎那被誉为圣人,1868年又被誉为“教会的老师”。到了1879年,他的神学诠释已被定于“正派”之尊,所有神学论著都必须符合其诠释。1880年他又被立为所有天主教育机关的守护圣人,俗称“学校的天使”。

阿奎那的著作很丰富。他从攻读硕士开始就一直挥笔写作,替教会或多明我会辩解讲道、解说教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著述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伦理论、政治论、天地论和形而上学著作的传注、《生存与本质论》(*De ente et essential*)、《真理争论的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veritate*)、《驳希腊教会的错误》(*Contra errores Graecorum*)、《黄金的锁链》(*Catena aurea*)、<sup>①</sup>《上帝力量争论的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potentia Dei*)、《邪恶争论的问题》(*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malo*)和《道德争论的问题》(*Quaestiones*

① 即关于新约圣经四种福音的注释。

*disputatae de virtutibus*)等。<sup>①</sup>在这些论著中,公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两部书:

其一是《驳外邦人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以往的传统评论将此书视为作者反驳伊斯兰教的专论,但近年来的研究结论却指出作者是从教会的哲学立场来反驳历来的希腊、罗马、犹太和伊斯兰教大思想家的。<sup>②</sup>

其二是被誉为“思想的大会堂”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其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只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可以与之相比。作者从1265年开始写作和修改此书,迄至1274年逝世前尚未完成。这部巨作包括三(四)部分:I.上帝的存在和性质,世界的创造,天使,人类的性质。II. I一般的道德,律法。II. II个人的道德,个人犯罪法。III. 基督的生活和行状,圣餐,世界末日。书中虽然涉及了两千多个神学上的问题,但其内在结构又可以分为三大部类,即上帝、人和人与上帝之间的调停者耶稣基督。<sup>③</sup>

① 娥踢恩·格里孙(Etienne Gilson):《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Thomas Aquinas*), Octagon Books, 1988, 381—439页,载I·T·俄沙满(I. T. Eschmann, O. P.)分析了阿奎那的98本著作,其中11本注释圣经里的某些书卷,12本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

② 托马斯·F·欧美拉(Thomas F. O'Meara, OP):《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家》(*Thomas Aquinas: Theologi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22页。最新和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为:不同翻译者,《驳外邦人大全:第一、二、三册》(*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s One, Two, Three, Fou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9—1992。亦见彼得·J·克里夫特(Peter J. Kreeft):《简明大全: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核心哲学段落》(*A Shorter Summa: The Essential Philosophical Passage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gnatius Press, 1993。

③ 托马斯·F·欧美拉:《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家》,41—86页,分析其内部的结构。

## 第五章 中 兴

### 一 序言

以文献学为主的中国经学的复兴较之西方要晚了几个世纪。直到清初顾炎武、阎若璩之时，小学的精辟考察才得以广泛地在经学的殿堂上亮相。而西方经学却早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之际就又重现于学术界了。起初，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与希腊同化时期相似，是由五位大师率先开启的。其中，彼特拉克(Petrarch)因其卓越的古典拉丁诗歌的欣赏与写作能力而首倡于前；继而，薄伽丘(Boccaccio)又以优美的拉丁散文为之助威增色；及至瓦拉(Valla)和波利齐亚诺(Politian)，则以典雅、正确的拉丁文写作以及拉丁文献的校勘与整理而促其大盛；赓续的波焦(Poggio)亦由于广泛收集各类零散的古典文献残卷而享有盛誉。

到了十六世纪，荷兰也出现了一位文艺复兴大师——伊拉兹马斯(Erasmus)。他是人文主义者，也是神学家，从事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整理与翻译，开始将传统的希腊文经学的注意力从荷马史诗转移到《新约》上去了。而同时期的法国文艺复兴则成了西方早期现代经学的先锋。当时斯卡利杰尔(Scaliger)是公认的文艺复兴晚期最博学的通才，

凭借其对于古典和近东文献的精通而创建了古代年代学；此外，卡索邦(Causabon)也以其博大的学识而为名物众多的历史地理类书籍加注作解。其后，生活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学者本特利(Bentley)又将校勘学予以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改造，为此后的通学建立了至高至严的学术标准。十八世纪的波森(Porson)，在校勘学方面的精辟胜于本特利，但缺乏后者之想象力与批评文学的精湛。本特利乃算现代经学家早期的典范。

在中国，针对文献学的经学从未中断。上文第四章已注意到自朱熹的文献学脉络经由王应麟、焦竑以及顾炎武的发展演变。从顾氏开始，考证方面的研究正式展开。兹就当时西方校勘学的技巧和文献学理论的成熟度而言，只有本特利才能达到顾炎武如此崇高的考证成就，要到下一章才会有能与清朝大儒媲美的大师亮相。本章中的西方经学家应目之为摸索中的开辟者。

### 二 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在欧洲从十四世纪延续到十七世纪的文化运动，其主旨在于艺术、文学、哲学、政治与宗教的振兴。如果着眼于人文主义者的一般行为，可以推断出下述定义：“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拉丁文深感兴趣。他们期望按照他们所认为的古代风格的标准去写作。他们注重收集有关的古代事实。为了得到新的古代文本，他们力求发现和校对新的抄本，并修饰已拥有的文本。虽然公元一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运用拉丁文写作了诗歌与戏剧，而十五世纪首要的人文主义者又撰写了历史或有关道德哲学之类论说并进行了翻译，但他们也常

常在其对于古代世界的崇拜之中,加上了自己积极入世和研治文学文献学的兴趣。”<sup>①</sup>不过,也有现代的历史家认为:人文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在学术上与鉴定和诠释古代文献有关的方法。<sup>②</sup>所以,如果说当时的文艺复兴基于拉丁文献学的崛起,也不算是过分的。伊拉兹马斯早在1518年就声称:文艺复兴在文学与艺术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基于正确的拉丁文的恢复的。<sup>③</sup>这其中也包括后来的希腊文的研究。因此,古代零散的文献抄本的收集、誊写、整理、诠释和翻译,实际上都是文艺复兴的核心研究方法。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五位大师当中,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arch, 1304—1374)不但是最早知名当世的,也是意大利首位使用本土语言的诗人。他热爱古罗马的拉丁文献,全力以赴地搜罗散落残零的抄本,潜心创作拉丁文诗歌,进而推动了拉丁文文学的研究。因此被后世视为人文主义之父。

彼特拉克生于意大利中部省会阿雷佐(Arezzo)城,幼年是在阿维尼翁(Avignon)度过的。他由于受到当律师的父亲的压力,被迫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和博洛尼亚(Bologna)修习了七年的法学;之后,便一直任职于教会文书,成名后亦出任教会的外派大使。由于他身为文书,因

而享有充足的时间写作。他也具有博闻强记的天赋,并热爱那些被其视为故里先贤的古代罗马文学大师。彼特拉克所自称的杰作是有关罗马将军西庇阿·阿夫利卡努斯(Scipio Africanus, 前235—前183)的九卷长篇史诗《阿非利加》(Africa)。其作写于1339—1341年和1343—1344年之间,但尚未完成,彼特拉克便已弃世;所幸的是该作已写就的部分以后陆续得以问世。<sup>①</sup>他的写作主要效法维吉尔的史诗创作,并承袭了《伊利亚特》的一些写法,<sup>②</sup>同时也受到了但丁的文学影响。<sup>③</sup>

彼特拉克所作的十四行诗是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抒情诗的样板。<sup>④</sup>他亲手结集的诗作共有366首,其中317篇是十四行诗,内含266首抒写其所爱恋美丽少女“萝拉”(Laura)的爱情诗。这一抒情诗集的主题涉及死亡哀悼、素朴生活、天然美景,流放行旅、生命短暂和时间流逝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爱情的破灭和绝望。<sup>⑤</sup>实际上这一突出明显的主题也是其写诗的动机之一。此外,另外一个强劲的创作原动力则是彼特拉克企盼获得桂冠诗人的渴望。因为他曾广泛研究罗马的

① 亨利·里夫(Henry Réeve):《彼特拉克》(Petrarch), BiblioBazaar, 2008, 75—82页。

② 西蒙·马开西(Simone Marchesi):《彼特拉克的考释史诗〈阿非利加〉》(Petrarch's Philological Epic (Africa)), 载《彼特拉克:全集指南》(Petrarch: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Complete Works), Victoria Kirkham and Armando Maggi 编,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13—130页。

③ 恩里科·桑坦戈罗(Enrico Santangelo):《彼特拉克阅读但丁:登上旺图山〈给亲友的信札〉4.1》(Petrarch Reading Dante: The Ascent of Mont Ventoux, Familiars 4.1), 载《彼特拉克在英国》(Petrarch in Britain), Martin McLaughlin 编, The British Academy, 2007, 95—111页。

④ 托马斯·戈达德·博金(Thomas Goddard Bergin)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The Sonnets of Petrarch),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5。

⑤ 托马斯·G·博金(Thomas G. Bergin):《彼特拉克》(Petrarch), Twayne Publishers, 1970, 154—179页。

① 彼得·马克(Peter Mack):《文艺复兴的辩论:修辞学与论理学(辩证法)传统中的瓦拉和阿格里科拉》(Renaissance Argument: Valla and Agricola in the Traditions of Rhetoric and Dialectic), E. J. Brill, 1993, 13页。

② 小查尔斯·G·诺特(Charles G. Nauert, Jr.):《人文主义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55页。

③ 克雷格·R·汤普森(Craig R. Thompson):《伊拉兹马斯全集》(Collected Works of Erasmus), 第23册,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8, xxi页。

文学历史,早已向往折桂夺冠。功夫不负有心人,彼特拉克经过多年的辛勤创作和积极播扬,终于在1341年,通过一个严谨的口试之局,被褒奖为罗马市的桂冠诗人并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不过,也许是因为此时彼特拉克在诗坛上的成就并不十分显赫夺目,所以后来有位现代学者称其对于诗人桂冠的孜孜以求,实属空前的自吹自擂、自卖自夸。<sup>①</sup>

彼特拉克在拉丁文散文写作中没有显露出独特的文笔,但其历史著作在叙述结构上却颇具影响力。其首要的历史贡献《名人列传》(*De Viris illustribus*),虽然借用了西塞罗所创立的传记体文体,可是又有自己的出新之举。他一反以往按照年代先后为序的传统叙述方式,改为总括概述或改写古代文献的片段,并加以自己的分析与结论。此举意在推介古代罗马闻人显达所表现的传统美德以励扬见贤思齐。此外,他还写了很多书信以及神学、道德、哲学论辩与抒情文章等各类散文作品。其中两部信札集是《给亲友的信札》(*Epistolae familiares*)和《晚年写的信》(*Seniles*)。前者收入了350封信,大多为1325—1359年间写给苏格拉底的;后者辑存了1361—1373年所写的128封信,是其晚年写给古代的尊贵贤达的,最后的一封即为著名的《写给后裔的信》(*Posteritati*)。彼特拉克自1345年发现西塞罗的信札集后,就下定决心效仿他,其主要的信札书写都是以西塞罗、维吉尔和塞内卡(Seneca)

公元前4—公元65年)等的书翰文笔为楷模的。

彼特拉克不仅热爱古代罗马文人的文学、信札、演讲、交友、道德标准等诸多方面的思想文化遗产,也赏心悦目地享受研读古代抄本所产生的欣赏乐趣,并非常珍惜其中所隐含的“以文会古友”的机缘。因此,他倾心于古抄本的收集,既有出于其读书藏书的一己喜好快乐,亦有为了研究古代思想与文学而准备历史资料的治学需要。由于彼特拉克引发了当时文献学的复兴,所以普法伊佛曾沿用彼特拉克对罗马历史家李维的评价来论述其振兴文献学的贡献:“彼特拉克远不止于用选择、誊写和补充李维的历史资料来编撰自己的历史著作。因为我们发现他在拥有李维的史书并看出其中的错误后企求予以修订,由此而带动了校勘学的复兴。他写在书页边上的训诂如其著作,包括例证和解释;他有机会时就将两种版本加以比照,耐心地记下所校对出的异体字,进而精湛地修订了其中的很多片段;而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学者能有类似好运或才华去作出如此贡献。”<sup>①</sup>普法伊佛还举例说彼特拉克旅行时,也带着一本维吉尔的巨著,并在书页边上写下阅读后的训诂心得,其中“有的表现出了他令人诚服的学问”<sup>②</sup>。

收集抄本原是人文主义者的共同之处,彼特拉克在此方面更为努力勤勉。他遍访意大利和法国各大修道院附属的图书馆,誊写抄本,阅读并写下注解或训诂,进而收集了几乎所有的古罗马文献,创建了西方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他曾期望依循古代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罗马公共图书馆的前例,将他的私藏图书献给威尼斯共和国。可惜的是他去世

① 尼克拉斯·曼(Nicholas Mann):《彼特拉克》(*Petr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8页。关于彼特拉克诗歌和史诗里的桂冠诗人形象,见萨拉·斯图尔曼-马多克斯(Sara Sturm-Maddox):《但丁、彼特拉克与桂冠》(*Dante, Petrarch, and the Laurel Crown*), 载《彼特拉克与但丁》(*Petrarch and Dan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9, 290—319页。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 8页。

② 同上,卷2, 9页。

后,这些藏书也散落,未能遂其心愿。但他对于当时“人文体”书法的发展产生了真切深入的影响,恢复使用了中世纪的所谓“加洛林小写字体”(Carolingian miniscule)。<sup>①</sup>

虽然彼特拉克是古罗马文化与文学的继承者,可是他也向往进入古代希腊人的心灵世界,尤其是企望了解作为罗马文学背景和基础的希腊文学的历史发展。只是不管他多么努力,却怎么也学不会希腊文。当他在晚年得到一份新译的拉丁文版本的荷马史诗以后,便十分努力地边看边画上彩色图画。可是他刚刚画好全部的《伊利亚特》和大部分的《奥德赛》,还未来得及涂上色彩便逝世了。

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其人文主义的道德和思想意识其实都是扎根于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中的。他毕生都随身带着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袖珍本。不管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彼特拉克的学术和文学活动之旨均在于道德修养上的修炼养成。也因此,他影响和启迪了十六世纪伊拉兹马斯的基督哲学。

当时另一位人文主义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也是彼特拉克的挚友。彼特拉克曾留下遗言要赠送一套大衣给他,在他们的通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但薄伽丘与彼特拉克善写独到的意大利诗歌有别,而以散文写作闻名,应视为小说家。<sup>②</sup> 其杰作是《十日谈》(Decameron)。一般说来,彼特拉克

克的诗歌、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史诗《神曲》共同奠定了现代意大利文的基础。

曾有一说称薄伽丘生于巴黎,这也许是后人的一种浪漫附会。其实他大概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在其首府佛罗伦萨长大。因其父从商,薄伽丘起初在银行工作,后来又求父亲允其修习法学,并在六年学习期间将研修范围扩展至科学与文学。当时他爱恋上一位已婚的公主,在其所写的很多爱情故事里称她为“菲亚梅塔”(Fiammetta)。<sup>③</sup> 他爱好文学,又与学者和上层社会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决心成为一名风雅的诗人。他早期的创作有8卷的《菲洛斯特拉托》(Il Filostrato),是关于一个特洛伊太子的爱情故事。<sup>④</sup> 还有长篇史诗《苔塞依达》(Teseida),共12卷一万行,也是描述古代希腊的爱情故事的。<sup>⑤</sup> 在1335—1336年间他写出了第一部意大利文小说,名为《菲洛柯洛》(Il Filocolo),意思是“爱情的劳力”。1374年他又创作了两部有名的散文著作《名媛传》(De mulieribus claris)和《关于名人的命运》(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sup>⑥</sup>

① 譬如,她是在1343—1344年间写就的一部9卷小说的主人公;见玛丽亚安哥拉·卡萨-斯坦德勒,托马斯·马克(Mariangela Causa-Steindler, Thomas Mauch)译:《菲亚梅塔的挽歌》(The Elegy of Lady Fiammett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有关薄伽丘这一思恋的经历,见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Francis Macmanus)的浪漫化叙述,《薄伽丘》(Boccaccio), Sheed and Ward, 1947, 54—65页。更具文学批评价值的是托马斯·G·博金(Thomas G. Bergin),《薄伽丘》(Boccaccio), The Viking Press, 1981, 168—180页。

② 托马斯·G·博金:《薄伽丘》, 94—111页。

③ 同上, 112—129页。意大利文“苔塞依达”(Teseida)指的是古代神话里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

④ 关于前者,见托马斯·G·博金:《薄伽丘》, 246—256页;弗吉尼亚·布朗(Virginia Brown)译:《名媛传》(On Famous Wom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 13页。

② 关于他们的文学写作共同点,见维托雷·布兰卡(Vittore Branca):《彼特拉克和薄伽丘》(Petrarch and Boccaccio),载《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世界的公民》(Francesco Petrarca Citizen of the World), Aldo S. Bernardo 编, Editrice Antenore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0, 193—221页。

薄伽丘从 1349 年开始撰写名作《十日谈》，大概于 1352 年完成该书叙述三个男人和七个女人为了避免佛罗伦萨所爆发的黑死病，躲到了城外山上的别墅里，在十天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述了一百个故事。其主题都与爱情有关。薄伽丘在描述这些故事时，大多采用了寓言的写作手法。但此举不同于中世纪惯常的寓言故事创作，其旨意并非宣扬基督教的道德与教义，反而是讽刺基督教的种种不是。薄伽丘笔下的这些故事后来也有不少出现在乔叟 (Chaucer, 1343—1400) 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 里。这是后者抄袭了前者，还是两者都利用了同一种文学资源，目前似无定论。但是，现代学者大卫·瓦拉斯称赞《十日谈》是欧洲第一部超越了地方区域的重要性而影响整个欧洲文坛的小说。<sup>①</sup>

就学术研究而言，薄伽丘也是一位古物爱好者和研究者。他曾搜集古代的神话，运用寓言诠释法来与基督教的传说作比较。其专著《异教诸神谱系》(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 (1360 年初版，1374 年修订) 就整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神话，提供了一个有关古代神话、历史与地理的资料库。他用了一生中最后二十五年的时光编撰此书，把它视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认为其价值远远超越了他早期的文学作品。<sup>②</sup>

1357 年薄伽丘又写了一部分分析但丁《神曲》的论著《但丁颂》(Trattatello in laude di Dante)。他生前最后的一些著作大多与但丁有关，如 1373 年有关但丁《神曲》的演讲就结集变成了《但丁神曲的解

说》(Esposizioni sopra la Commedia di Dante)。<sup>①</sup> 然而，在普法伊佛看来，薄伽丘的这些研讨并没有以真正批评的态度去处理所研究的文献，毫无选取最佳版本的意识，也没有认识到从事校雠工作的必要性。<sup>②</sup>

总而言之，薄伽丘对于经学复兴的贡献主要在于以富于美妙灵感和文笔的描写引领和振兴了当时拉丁文散文的写作。但他同时也致力于传播所挚爱的古代文学。比如对于他良师益友彼特拉克的文学业绩就一直大力推介；1360 年前后，他还邀请了一位希腊人利安德·彼拉多 (Leonzio Pilato, 1388 亡) 到佛罗伦萨，住在自己家里三年，教授希腊文；后来又推荐其进入佛罗伦萨大学成为欧洲首位希腊文教授。而彼拉多在此期间也完成了第一部现代的荷马史诗拉丁文译本，藉此将荷马介绍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sup>③</sup> 应该承认，薄伽丘的确是一位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拓荒辟路、建功立业的先驱者。他与彼特拉克一起，奋力将当时文学界的注意力转回到了古代罗马与希腊。只是他在当时经学复兴中所取得的小学业绩不及后者显赫。

与上述两位有所不同，波焦·布拉乔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 这位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称不上是经学大师，甚至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仅仅是一位擅长写作拉丁文散文的文人和抄本收集者。但是他在散文写作和文献整理方面的建树却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学复兴。

波焦也出生在彼特拉克的诞生地阿雷佐城附近的小镇，曾去佛罗

① 大卫·华莱士 (David Wallace) 的分析与翻译，《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托马斯·G·博金：《薄伽丘》，286—336 页。

② 同上，230—245 页。

① 有关但丁的这两部专著，同上，214—229 页。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2，23 页。

③ 同上，24 页。

伦萨修学拉丁文与希腊文,其誊写抄本的书写字体令人赏心悦目。后来,他进入教会当了红衣主教的书记,接着又转至罗马教廷服务,担任过教皇的秘书和使节;但一直未出家为僧,于五十七岁时娶了一位十八岁的太太,并写了一篇辩解文章《关于老人应否娶妻的对话》(*An sen sit uxor ducenda dialogus*);晚年还在佛罗伦萨地区修建了一座放置许多半身像、硬币和石刻等古董的大别墅。

1453年,波焦当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宰相与史学家,与之紧密相关的学术硕果应是《佛罗伦萨的历史》(*Historia Florentina*)一书的写就。他曾自称撰写此作效仿了李维的笔法文采,只是语气过于轻快。其他人文主义者亦言其文采生动和灵活,不过不太规范和雅致。他的《趣语》(*Facetiae*)是一部收入了很多有趣而又偏于淫秽的故事选集,最能代表其拉丁文写作的轻快风格。<sup>①</sup> 瓦拉曾嘲笑过他所写的拉丁文,称其为“厨房里的词语”(culinaria vocabula)、“厨房里的拉丁语”(Latinum culinarium),是向厨师学来的。此意思是说就像厨师做饭时把锅、盘都打烂了一样,波焦也把拉丁文语法规则打破了!<sup>②</sup> 虽然波焦的文风评价不一,争论不休,但其仿效属于古罗马字体的“加洛林小写字体”的文字书写却非常精致,赢得了众口称誉。1501年伟大的印刷家奥尔德斯·马努提斯(Aldus Manutius, 1449/1450—1515)又模仿波焦的书写字体,衍生出现代所谓的“斜体字”。

波焦曾充当教会的使节,每次出差在外都会去寻找图书馆或藏书

楼里的古代文学遗文,或自己抄录或请他人誊写。他在半个世纪里几乎走遍了欧洲(包括英国)各地的修道院、大教堂藏经楼和私人庄园图书室,所搜集到的古代罗马文献遗产颇为丰富,拥有了当时数一数二的私人藏书。<sup>③</sup> 如他和彼特拉克一起搜寻到了古罗马一代文宗西塞罗全集中一半以上的著作。他也很乐意借助通信来宣告新的文学抄本的发现,因此而留存下来的信札多达600封,是分别写给172位不同的通信者的。这些信札并不包括他替教皇所写的信件和公文、序文等,也不是论说和批评文章。<sup>④</sup> 其中93封信是写给同样积极搜集抄本的人文主义挚友尼古拉·德·尼科利斯(Nicolaus de Niccolis, ?—1437)的,英译本透露了他们收集古抄本的种种酸甜苦辣。<sup>⑤</sup> 同时,由于波焦常常出差去各地旅行,所以他的书信又有很多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述。他也曾经尝试过粗略的校对工作,但似无专家学者的识见,无甚成效。他所翻译的色诺芬(Zenophon, 约前430—前354)的《居鲁士大帝记》(*Cyropaedia*)的希腊文拉丁译本就充满了错误。应该说,他对当时经学发展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其拉丁文散文写作和收集抄本这两方面的卓越成就。

当时,也有一位拉丁文语言学家洛伦索·瓦拉(Lorenzo Valla,

① 恩斯特·华尔塞博士(Dr. Ernst Walser):《佛罗伦萨的波焦:生活与贡献》(*Poggius Florentinus: Leben und Werke*), B. G. Beubner, 1914, 104—110页。

② 有关其全部文作,见恩斯特·华尔塞博士:《佛罗伦萨的波焦:生活与贡献》, 417—423页,其中记载了95篇。

③ 菲莉斯·瓦尔特·古德哈特·戈尔丹(Phyllis Walter Goodhart Gordan):《两位文艺复兴的寻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与尼古拉·德·尼科利斯的通信》(*Two Renaissance Book Hunters: The Letters of Poggius Braccionlini to Nicolaus de Niccol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① 无名氏译:《波焦的逸闻妙语》(*The Facetiae Or Jocular Tales of Poggio*), General Books, 2009重印。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36页。

1407—1457) 大力倡导仿照古代拉丁文的写作,以摒弃当时基督教化的白话拉丁文。但他又与波焦大相径庭,只注重典雅、正确的拉丁文用法而忽视其生动、灵活的普遍应用。

瓦拉生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省(Piacenza)的省会。1431年他加入了僧侣行列并寻求高级秘书的职位,未能如愿之后,就去帕维亚(Pavia)当了修辞学的讲师,但其似乎终身都有着非议同时代名人的拉丁文的嗜好,在那里也因批评当地有名律师的拉丁文行文而惹了麻烦。其后,他又转至其他大学寻职,也去过很多城市演讲。从1435到1448年,他在那不勒斯(Naples)就任了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Alphonso V. of Aragon, 1396—1458)的私人拉丁文秘书。此后九年他则当了教皇的抄写员和秘书。

瓦拉毕生呕心沥血研究拉丁文的杰作《优雅的拉丁语言》(*Elegantiae linguae latininae*),是一本拉丁文写作指南,于1471年出版,<sup>①</sup>在1550年以前就已印行了60多个版本。其要义是主张文采优美的拉丁文如同真理,而文采粗劣的拉丁文则是谬误。此书的前言盛赞拉丁文,将其视为类似罗马城一样的永恒,并认为罗马国虽已破灭,但其语言依然留存;若要复兴罗马的古代辉煌,则必首先重现拉丁文的古代光芒。<sup>②</sup>由此,他倾力于以其所精通的拉丁文古文法和写作法来鉴定古文献抄本的真伪,而且功绩颇多。

如有一份叫做《君士坦丁的赠赐》(*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古代文件,最早的抄本在八世纪时藏于巴黎北郊圣但尼(St. Denis)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40页称此书早在1440年就写成了。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35页。

大教堂,曾被视为欧洲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贋品。该文件拥有者称这一文件系四世纪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亲定的公文,要授权给当时罗马的大主教,使其地位高于其他四位大主教,也就是意味着视其为教皇,同时亦将很多领土划归罗马教会管辖。所以此公文涉及教会内部权力和财产等一系列最为敏感的历史问题。<sup>①</sup>瓦拉认真分析《君士坦丁的赠赐》的拉丁文措辞、文法和语用特点,并加以历史事实与严谨逻辑的考辨,进而证明其用语并非出自古代四世纪的语言环境,而是八世纪时教皇的公务术语。同时,瓦拉也指出此文件中的拉丁文运用相当粗陋,谬误不少。如瓦拉指斥文件伪造者:“你这个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文字学问的人,为什么我要期望你有一点点聪明,一点点的学问,因为你该说‘灯’,却说‘光’;你应说‘调到东方地区去’却说‘调在东方地区去’……”<sup>②</sup>他还从拉丁文措辞的得体 and 优雅的考察角度,指出该文件中的“synclitus”、“banda”、“censura”分别应写作“senatus”、“vexillum”、“diploma”。<sup>③</sup>瓦拉的这些辨析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君士坦丁的赠赐》的真相:原来八世纪时的教皇力求承接当时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日渐衰败的权力,而逢迎者便伪造这一贋品来提供文本上的证据以显示教皇谋权的合法性。瓦拉的如此考证同以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学者们鉴定出自帕加马的文献卷子一样,都是小学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安东尼·格拉夫顿因此而称赞瓦拉的这一文献

① 克里斯托弗·B·科尔曼博士(Christopher B. Coleman, Ph. D):《洛伦索·瓦拉论君士坦丁的赠赐:文本及其英文翻译》(*The Treatise of Lorenzo Valla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ext and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2。

② 同上,99页。

③ 同上,6页。

鉴别是“新人文主义文献学的圣战”<sup>①</sup>。

瓦拉除了文献鉴定颇有成就之外,他的优美典雅的拉丁文写作也成为后世的典范。伊拉兹马斯就曾在其《学习方法论》(*De Ratione studii*)中称誉其为拉丁文优雅文笔的最好榜样,是“绝妙拉丁美文的优雅裁决者”(The extremely elegant arbiter of elegant Latin)<sup>②</sup>。他也把一些古希腊文学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并对《新约》的诸多抄本作了很多训诂。其中有关《新约》的初步校勘为日后伊拉兹马斯进行更为系统的校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sup>③</sup>他还曾将四世纪杰罗姆的《新约圣经》拉丁文译本与其希腊文译本的原文相互对照比较,予以批评,尤其对其翻译的文采持论严厉。

瓦拉在校勘学批评上乐于苛求他人提出的校勘修订方法,但同时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修补订正建议。普法伊佛曾强调说其意见大部分是对的。<sup>④</sup>比如瓦拉《关于李维的补正》(*Emendationes Livianae*)就集中收入了他诸多有关李维《罗马史》的训诂及其修订的词、句。当时瓦拉有幸得到了彼特拉克当年所拥有的李维著作原版本,并在彼特拉克写在书页边的训诂旁,又接着写下了自己的校勘笔记。因此,他的这本书又能提供很多切实的资料,可以让人深入感悟到彼特拉克始于猜疑的整理方法和作者基于语言的修订方法。另外,如将瓦拉此书与其

作于李维著作原版本上的训诂进行比较,也不难看出他有关李维著作的校勘整理在早期和成熟期之间的差别及改进。<sup>①</sup>

总之,瓦拉在校勘学方面开创了依据古代文献的语言来辨析其真伪的新方法,给了以后校勘学家特别是最为成熟的佼佼者波利齐亚诺很大的影响。伊拉兹马斯也曾在一封信里,高度评价了他对于整个文艺复兴的重要贡献:“瓦拉,透过无穷的体力、热忱和劳力,反驳了诸多野蛮人(即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愚蠢,拯救了快要消失的半埋藏的信件,将意大利古代雅言的光辉复兴给她,强使连有学问的人以后也得谨慎一点讲话。”<sup>②</sup>

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须要提及的大师是整个文艺复兴时代最权威的经学家和校勘学家安杰罗·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tian, 1454—1494)。他的原名为安杰罗·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因生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蒙特普齐亚诺(Monte Pulciano),所以在意大利语中又称作安杰罗·波利茨安欧(Angelo Poliziano, 波利齐亚诺 Politian 为其以后英文文化的发音)。

波利齐亚诺 10 岁时,当律师的父亲被政敌暗杀,成了孤儿后被送到佛罗伦萨学习。他 13 岁能用拉丁文写散文,16 岁能用希腊语作诗;18 岁时又把《伊利亚特》的第二卷至第五卷翻译成拉丁文的六音步诗,

①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伪造者与批评者:西方学术的创造性与两面性》(*Forgers and Critics: 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页。

② 克雷戈·R·汤普森编:《伊拉兹马斯全集》,第 24 册,670 页。

③ 同上,617 页。

④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 2,37 页。

① 有关其校勘工作与贡献,见弗兰科·加埃塔(Franco Gaeta):《洛伦索·瓦拉:文献学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历史》(*Lorenzo Valla: Filologia E Storia Nell'umanesimo Italiano*), Nella Sede Dell'Istituto, 1955, 77—126, 欧塔维奥·巴索尼·玛丽安吉拉·雷高楼斯(Ottavio Besoni, Mariangela Regoliosi)编:《洛伦索·瓦拉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Lorenzo Valla e L'umanesimo Italiano*), Editrice Antenore, 1986, 21—71 页。

② 克利斯多弗·B·科尔曼博士:《洛伦索·瓦拉论君士坦丁的赠赐》,3 页。

被誉为“小荷马”(Homerius adulescens)。而他用母语意大利文来作诗也一样出色、有名。其所写的剧作《奥菲欧》(Orfeo)是最早把传统戏剧由宗教转向俗世的革新之一,可以视为现代歌剧的先声。<sup>①</sup>

由于波利齐亚诺已故的父亲生前属于当时佛罗伦萨城独裁者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1449—1492)的政党,因此他得到美第奇的力助,不仅住进其家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接受了他所安排在佛罗伦萨大学的学术职位。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常以注释作为主要的学术活动,其开端常常始于大学的授课和演讲,然后经由修改、润色再去发表。波利齐亚诺也不例外,他在佛罗伦萨大学讲课的内容均针对着古代文学家和历史家的文献,并在修改、充实之后发表,编成专著。在当时,他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精通希腊文的意大利本土学者,一点也不逊于由拜占庭移民过来的学者,所以他也翻译很多古代希腊文献,同时也作了许多训诂工作,是当时校勘古希腊文献的西方(相对于东方的拜占庭而言)学者第一人。

波利齐亚诺一生最重要的杰作是献给他恩人美第奇的《杂记》(Miscellanea)。它是波利齐亚诺后期训诂校勘的精髓汇纂,条目繁富,内容博大,包括文献学笔记、词源考究、衍文修订、抄本校讎、版本谱系关系梳理等等,涉及语言学、年代学、考古学、翻译学和校勘学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特意以有别于当时注释体的古代“随笔体”写成。其研究范围之深广,小学治学之精湛,影响后世之巨大,堪比中国明代王应麟的宏著《困

学纪闻》。现代学者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在评析此书的创新和长处时,特别强调了波利齐亚诺处理文献的新贡献:一、文献必多且佳;二、不能误用文献。其中后者也涉及当时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如前所述,当时一般的学者通常是将课堂上的讲授修改成书的,其文献的使用亦受到了口头宣讲较为随意、松散和不严谨的影响。如口授时所引用的文献常常不很精确,只能介绍大概的意思;而一般人凭借记忆而所引述的文献片段也不可能是长篇大论,难以齐全周密;同时,讲课时为了吸引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些论学之外的表演娱乐成分。不过,波利齐亚诺却一直保持着严谨的书斋研习秉性习气,超脱了这些讲课的时俗。他论学时总是随身携带着诸多的相关文献,引用原文时要查出其出处以确定无误,并且说明其出处的页数和版本;如果所用文献资料系由他处转引,他也一定加以说明。可以说,如此慎重严谨地使用文献资料是波利齐亚诺获取校勘学丰硕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sup>②</sup>

波利齐亚诺取得当时校勘学的不凡业绩,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锐意更新和突破的历史观。对此,格拉夫顿曾特地举出一例予以赞美:以往的校勘学家惯用统计方法来整理不同古文献抄本的异文。比如说在十份抄本之中,七份内有“甲”异文,三份只有“乙”异文;那么按照统计学的定式,七胜三,编辑者应采用“甲”异文。但波利齐亚诺却不盲从此法。他首先判断各个抄本的价值,用历史研究方法来确定它们的谱系关系;凡是出自同一原文的分支抄本,因为没有独立证明的价值,就

<sup>①</sup>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43页。见路易斯·E·楼尔德(Louis E. Lord)译:《安东尼奥·波利齐亚诺的奥菲厄与托尔夸·塔索的阿民塔》(A translation of the Orpheus of Angelo Poliziano and the Aminta of Torquato Tasso), Greenwood Press, 1931; 1986重印。

<sup>②</sup>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文本的护卫者:科学时代的学术传统,1450—1880》(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4页。

搁置不用。在他看来,抄本的价值和真伪的判定,不在于抄本中各异文的数量和比例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各异文所具有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他在《杂记》里明确提出:“依我看,古人的证据不应该一份一份的数,而应该一份一份的衡量。”<sup>①</sup>与此相关,他在诠释拉丁文诗歌时,也是坚持探究其中宗教或哲学等方面的影响。<sup>②</sup>对现代人而言,波利齐亚诺这一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已属常识,然而在当时学者看来,它们却是历史文献整理和校勘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

波利齐亚诺在校勘学上还有一个优势是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悉古代希腊文的文学遗产。他不仅在整理拉丁文文献时能够辨识出拉丁文的错字以及用拉丁文拼写的希腊文外来词,也能够解读基于希腊文诗格的拉丁文诗歌,修正其中错误的音节或韵脚,还可以看出拉丁文诗歌是否受过希腊文诗歌的影响或者是否是译自希腊文。

1494年,波利齐亚诺刚满四十岁,还未来得及整理出一部古代作家著作的定本,就已去世。尽管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并不认同其革新的历史观,还是宁愿作抄本数量上的考查,而不愿意去作历史价值的衡量,但是在以后的学者看来,他是西方校勘学的开山祖师。自十六世纪起,欧洲的学者们皆接受了他在校勘学领域具有革命性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虽然如此,在文献学方面,这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之所以亚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学者是因为前者的范围广泛多了。亚历山大学者的研究范围限于将古代的文献整理、保存与传授于后世;但人文主义者旨

①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文本的护卫者:科学时代的学术传统,1450—1880》(*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57页。

② 同上,65—67页。

在将希腊、罗马整个文明保存与传授。因此,文献学是他们的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sup>①</sup>亦即附属于 *studia humanitatis*。<sup>②</sup>专业的文献学家要到第十六世纪的法国文艺复兴才出现。我们现在略看第十六世纪的荷兰经学大师伊拉兹马斯。

### 三 十六世纪的荷兰

在十六世纪的荷兰,有一位学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经学的发展方向。其中的德斯德利尤斯·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469—1536),既是人文主义者,也是神学家,同时还应被视为经学家。他的拉丁文写作为文笔非常纯净洁美,人格也十分高尚,故而后来有人誉其为“人文主义者中的太子”。他毕生所提倡的“基督的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融合了基督的道德行为和严谨的学术研究,进而形成了创立于教会文献整理的基础之上的人生观。在当时马丁·路德大力发动全盘推翻教会的革命之际,他却在幕后悄悄地策动教会内部

① 英格丽·A·R·迪斯梅特(Ingrid A. R. De Smet):《侏儒肩膀上的巨人? 文艺复兴及早期现代学术对现今经学家价值的回顾》(*Giants on the Shoulders of Dwarfs? Considerations on the Value of Renaissance and Early Modern Scholarship for Today's Classicists*),载《文本、观念以及经典:学术、理论以及经典文学》(*Texts, Ideas, and the Classics: Scholarship, Theory,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S. J. Harrison 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52—264页。

② 埃里克·彼得森(Erik Petersen):《与死者沟通:对人文研究和人文主义者文献学的性质的笔记》(*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Dead: Notes on the Studia humanitatis and the Nature of Humanist Philology*),载《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用法:历史文章》(*The Uses of Greek and Latin: Historical Essays*), A. C. Dionisotti 等编, The 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8, 57—69页。

的改革。<sup>①</sup>只是其努力未获成功,最后革命者战胜了改革者,导致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历史分裂。

伊拉兹马斯于1466年生在鹿特丹(Rotterdam),自1483年其父亲同患黑死病去世后,便在几所良好的修道院附属学校之间辗转求学,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共生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所创办的学校。他深受其思想熏陶,确立了追求古代智慧与信仰基督的信心。于是,他在1486年出家进入了修道院,1492年升任教会的祭司,1493年又去巴黎为当地的主教服务,同时也专心修习希腊文。

1498年伊拉兹马斯应学生之邀前往英国,在牛津大学结识了由意大利修学归来的大师约翰·科莱(John Colet, 1467—1519)。当时科莱并不认可英国学术界时行的中世纪寓言诠释法和较为现代化的象征学,反而欣赏彼特拉克有关西塞罗信札和圣彼得《新约》里信札的小学诠释方法,认为后者可以使人明了作者的宗教思想而效法其德行。这对于伊拉兹马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影响,也推动他把修学的重点从传统的经典拉丁文文学转向希腊文《新约》圣经与教会早期的神学家及历史家。为此,他又回到巴黎继续研修希腊文。后来因为他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成就卓然,教皇免去了他服务教会的承诺,使他能够自由地周游欧洲问学访友,曾两次重返英国,<sup>②</sup>也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住了八年,直到1536年为逃避宗教纷争,才归国返乡,但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

伊拉兹马斯写作勤奋,著作颇丰,尤其善于揭露教会的各种弊端和人类诸多的愚蠢、迷信举动,其“基督化的人文主义”都是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调来抒写宣扬的。他写于1509年的《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sup>①</sup>1503年的《基督教骑士手册》(*Handbook of a Christian Knight*)和1516年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都以个人的道德修行作为论述主题,是其思想理念和写作风格的代表作。此外,他于1512年写的《丰盈:文笔多彩之本》(*Copia: Foundations of the Abundant Style*)则是一种修辞学的学习指南,指导如何造就昂扬奋发的写作或演讲风格。他也热爱谚语,一生中收集了1000条以上,有些还是其自创的,都汇集编成了《谚语》(*Adagia*)一书。<sup>②</sup>他还有一部《谈话录》(*Colloquies*),记载了他所编撰的与古人和今人的对话。<sup>③</sup>

伊拉兹马斯的经学杰作应是圣经《新约》的定本。他在整理此典籍之初,倾注全力寻找到最佳抄本,最后终于择选出罗波特斯·斯特佛努斯(Robertus Stephanus, 1503—1559)于1550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作为底本。当他整理到《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时,仅有一个希腊文抄本可供参考,而且其最后的几段还有缺文,所以他只能依照早期拉丁文本的翻译来补上这些希腊文的遗缺。<sup>④</sup>1516年伊拉兹马斯的《新约》

① 约翰·惠钦格(Johan Huizinga):《伊拉兹马斯与改革时代》(*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BiblioBazaar, 1924。

② 有关其游历英国的概述,见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72—73页。

① 罗伯特·M·亚当斯(Robert M. Adams):《愚人颂及其他著作》(*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W. W. Norton, 1989。

② 威廉·巴克(William Barker)编:《伊拉兹马斯的谚语》(*The Adages of Erasmu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③ N·贝利(N. Bailey)译:《伊拉兹马斯的谈话录》卷1(*Colloquies of Erasmus, Volume I*), BiblioBazaar, 2010重印。

④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77页。

希腊文/拉丁文翻译对照本终于问世了。它是历史上首次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定本。其拉丁文翻译是根据杰罗姆(Jerome, 347—420)的拉丁文译本(俗称武加大(Vulgate)译本)修改而成的。此书出版后,轰动了西方文化世界,影响极大。在宗教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就借鉴了该书1519年的第二版,而1526年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的第一部英文译本大概也袭用该书1522年所出的第三版。现在这部书于1535年出的第五版则成了公认的经典传统本。而在经学界,该书中希腊文/拉丁文的翻译对照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学习希腊文的便利,以致一度引起了很强烈的希腊文学习“热”,进而将当时经学家关注希腊文献的重心从荷马转至《新约》。以后直到1795年,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 1759—1840)的《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问世,才使得西方经学研究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了荷马的史诗上。在中国,似乎只有朱熹及以前的道学家将其治学中心从《五经》改为《四书》,才能发生类似的影响广大的学术转换。

在西方文化史上,伊拉兹马斯扮演了社会与教会批评家、宗教改革者、神学家、文学家、书信家、翻译家和经学家等重要角色。但他的小学治经方法与文献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德育的培养。在他看来,《圣经》零散抄本的混杂错乱情况使得当时的神父和学者难以切实掌握其中神圣的训诫,只有经过严谨的校勘整理、翻译及出版,才能让读者领悟并实践其训教精神。伊拉兹马斯这一治学动机完全契合了中国传统经学家“治经以修身”的研习目的,其由此而衍生的学术和德行也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重大的引领效应。

#### 四 十六世纪法国文艺复兴

虽然十六世纪法国的文艺复兴基于希腊文的研究,但又不限于此。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卡利杰尔(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就是公认的这一文艺复兴的晚期最为博学的通才,其著述涉及语言学、经学翻译与校勘学、年代学、天文学、铭文学等诸多学术领域。<sup>①</sup>他生在法国西南部的阿根(Agen),十二岁时与弟弟一起被送到波尔多(Bordeaux)学习;三年后由于瘟疫的爆发,逃回了家乡,当了几年父亲的秘书。斯卡利杰尔的父亲也是一位学者,热爱抒写拉丁诗歌,让他从小就潜心于拉丁文的写作,每天都要写作文,还要记录下父亲每天所吟咏的八十到一百句的诗作。这样斯卡利杰尔慢慢地磨炼出了写诗作文的如花妙笔,尤其精于早期拉丁文,为其以后具有权威性的拉丁文文献整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十七岁时,他开始了在巴黎大学的四年求学,但度过最初两个月之后,就发现在希腊文老师处无甚获益,便改为自修,曾用二十一天时间看完了荷马的史诗,又读了几乎所有希腊历史家、戏剧家和演说家的著作,还边看边编写自己的希腊文语法书,后来又研习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不过,斯卡利杰尔并非仅仅关注文献校勘学问,他自小就喜好考察历史的发展和史实,以后在从事校勘学之

<sup>①</sup> 关于其生平,见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14—118页;雅各·巴尔纳斯(Jacob Bernays):《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卡利杰尔》(*Joseph Justus Scaliger*), 1855; B. Franklin, 1955重印;查理·尼撒尔德(Charles Nisard):《尤斯特·利普修斯,约瑟夫·斯卡利杰尔和艾萨克·卡索邦》(*Juste Lipse, Joseph Scaliger et Isaac Casaubon*), 1852; Slatkin Reprints, 1970, 149—308页。

时,又兼任历史批评家。同时,他因为要注解有关天文学、年代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对了解和钻研数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兴趣盎然<sup>①</sup>。

自1563年起,斯卡利杰尔陪着一个年轻的公爵差色坦尔的路易(Louis de Chastaigner)游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在此期间,他脱离了天主教,转而皈依基督教。1572年雨格诺教徒(Huguenot)的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迫使他逃往瑞士避难。其一生中多半是这样边逃难边研修的流浪生活。如从1574年至1594年的二十年里,他就一直和差色坦尔的路易在一起,过着时而流离失所的动荡日子。直到1593年,他才找到安居之处,担任莱顿大学的教授。

斯卡利杰尔的博学多识不但在十七世纪的西方学术界首屈一指,而且赢得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通才的美称,被公认为“学者中的王子”(Prince of Scholars)。在中国经学史上,也只有东汉郑玄的博学能与之媲美。安东尼·格拉夫顿曾撰写了一部二卷本的专著,分析斯卡利杰尔的治学方法与贡献。其中第一卷论其校勘学,第二卷论其年代学和天文学。斯卡利杰尔的这三类学术研修范围也与郑玄很接近。<sup>②</sup>

斯卡利杰尔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因而赞同伊拉兹马斯基于文献学的治学理念:“Non aliunde discordiae in religione pendent quam ab

ignorantia grammaticae”(所有的宗教纷争皆来自文法上的愚昧)。此所谓“文法”,即整理文献的方法。不过,斯卡利杰尔毕竟不是神父,而是纯粹的学者,其校勘学研究还是超出前者限于宗教文献的范围。如他整理古代诗人马尼利乌斯(Manilius,活跃于公元一世纪)所作的占星学史诗《天文》(Astronomica)时,其目的就不是校定正本,而是企求重建当时的天文学。这一举动也表明他已从纯粹的文献学整理正式转入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斯卡利杰尔的学术杰作应该是1606年完成的《年代学辞典》(Thesaurus temporum)。该著试图重建古代文明在年代学上的体系,并借此来确定上帝创造地球的年代。就其中精通古代文献和古代年代学的内容而言,在清代之前的中国也只有东汉通儒郑玄能与之比肩。尽管斯卡利杰尔没有提出“古代通学”这一名称,但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已昭示了十八世纪德国“古代通学”的诞生。比如,在他写给友人萨尔马西于斯(Salmassius, 1588—1653)的信里,有关古代希腊诗风经过四阶段沿革的论述就启发了以后温克尔曼(Winckelmann, 1717—1768)的古希腊艺术“四段说”。他还将所收藏的拓本捐给贾纳斯格吕泰(Janus Gruter, 1560—1627)编撰1602年的《古代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antiquarum),并编写了二十种引得。

安东尼·格拉夫顿在总结其学术贡献时,称赞说:“他率先以完整的小学方法去同时处理古典和近东的文献……他的研究可归于两大范围:古典文献学和历史编年学。在每个领域里,他都借鉴了前代学者及其竞争者的著作。他颇多创意,但其在各个领域里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创造全新的方法,而在于将以前用于不同领域的方法合并起来,以一

① 安东尼·格拉夫顿:《文本的护卫者》,108页。

② 安东尼·格拉夫顿:《约瑟夫·斯卡利杰尔:经学史上的研究》卷1《校勘学与注释学》(Joseph Scalig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 Textu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Clarendon Press, 1983;《约瑟夫·斯卡利杰尔:经学史上的研究》卷2《历史年代学》(Joseph Scaliger: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I. Historical Chronology), Clarendon Press, 1993。

种学科的思想方法来充实和加强另一种学科。”<sup>①</sup>他曾自称要变成“两事之批评家”，<sup>②</sup>他也果然实现了这一崇高的目标，成为了当时的通才。

斯卡利杰尔的挚友艾萨克·卡索邦(Issac Causabon, 1559—1614)，也继续了这一古代通学的治学传统，但他不是自愿的，而是不得已为之。这也许主要是因为他缺乏校勘文献的先天才能，既不够精辟，不能从事历史的重建，也缺乏丰富的想象力。不过，他有自知之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以他执著的好古精神和无比的恒心去持续广泛地阅读和搜集文献材料，甚至自命为历史与历史地理文献的注释家。<sup>③</sup>

卡索邦的双亲原是避难于日内瓦的法国雨格诺教徒，后来回到法国隐居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小镇，但不时须躲避天主教暴徒的袭击。卡索邦幼年跟随父亲修学，曾在洞穴里偷偷地学希腊文；十九岁时前往日内瓦的学校继续修习希腊文。1581年，他二十二岁时，接受了其师临终时遗命继承的教职，担任希腊文教师直到1596年。其间，他经由朋友的介绍，成了斯卡利杰尔的笔友，虽然从未相见，却逐渐变成了神交的挚友。

1599年，卡索邦的许多法国文人朋友，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徒，同情他当时经济上的窘迫和学术环境的不理想，联手推荐其进入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任教。但三年之后，他的经济情况依然

没有改善，只好又辞职了，并于1600年迁至巴黎从事编辑工作。1604年卡索邦就任皇家图书馆副馆长，却又因是雨格诺教徒，觉得当时天主教占有优势的巴黎并非安身立命之地，所以转而应邀去了英国，在那里度过了一生的最后23年。虽然卡索邦如此艰辛地四处寻找依靠，但当时的国王却视其如仆从，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命其捉笔，写一些政治与宗教上的辩解文章。如国王就曾命令已加入国教安立甘会(Anglican Church)的卡索邦撰文反驳红衣主教卡萨·巴若尼(Cardinal Caesar Baronius, 1538—1607)立足于天主教立场而编写的《教会编年史》(Annales ecclesiastici)。1614年，卡索邦终因此类写作过于劳累而辞世。

卡索邦早在居留巴黎期间就已成名，就学问的博大而言，其盛名仅次于斯卡利杰尔。他撰写的许多经典注释本时行了两百多年，才被新出的注释本所取代。如1587年斯特拉波(Strabo, 前64/63—24)的《地理》(Geographica)(1620二版)的注释本就是最成功的例证之一；其他的重要注释本还包括1592年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约前371—287)的《人物刻画》(Characters)(1599二版, 1612三版等)、1595年苏埃托尼乌斯(Seutonius, 约69/75—130)的《凯撒传》(De Vita Caesarum), 1600年阿特纳奥斯(Athenaeus, 约公元三世纪初叶盛行)的《哲人燕谈录》(Deipnosophistae)等。可以说，没有任何西方经学注释家的作品能比他的注释本具有更广大更持久的影响和效用。普法伊佛也曾大发感叹，说卡索邦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有足够的学识，能去注释类似斯特拉波或阿特纳奥斯的著作了。<sup>①</sup>

①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21页。

① 安东尼·格拉夫顿：《约瑟夫·斯卡利杰尔：经学史上的研究》，卷1，2页。

② 同上，3页。

③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21页。有关其生平，见《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艾萨克·卡索邦，1559—1614》(Isaac Casaubon, 1559—1614)，1892；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0重印；查理·尼撒尔德：《尤斯特·利普修斯9—1614，约瑟夫·斯卡利杰尔和艾萨克·卡索邦》，309—456页。

卡索邦的日记《星历表》(*Ephemerides*)迟至1850年才得以出版,但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当年既埋头苦读又虔诚信教的日常生活。以下摘录几则,以窥一斑:

二月二十日:五点起床(可悲!如此晚!),马上进入了书斋,那儿祷告,与巴西尔(恺撒的巴西)(Basil of Caesarea, 330—379)同在……

二月二十一日:虽然五点起床,我得离开书斋,进城办事;到七点(太可惜了!),才进入书斋。祷告完,吃午餐前的时间都花在巴西的身上。此后备课,因为没有上课,所以白做了。其余的时间献给了巴西、晚餐和向上帝祷告后的床……

二月二十二日:五点起床。进了书斋,祷告完了以后,就献功于巴西。午餐后,朋友们让我忙了起来。晚餐后祷告,休息……

三月十一日:早上的祷告,八点前通过上帝的协助将巴西看完了……<sup>①</sup>

这几则日记表明卡索邦对早期教会的神学家颇有兴趣,认真研读了当时相关的著作和历史文献。这也促使他成为当时最精通早期教会希腊文作家作品和时代背景的学者。<sup>②</sup>

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也曾夸赞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其生性就是注释家,尤其擅长注解那些非博学之人不能注释的作家著

作,凡是出之其手的作家作品注释都是确切无误的……它们虽与很多后世的传注相异,但其识见和文采很是奇妙。所以,现今我们还得依靠卡索邦与斯塔佛纳斯的辛劳所积累的这些财富。”<sup>③</sup>

## 五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经学

传统的英国经学要到十七世纪末本特利成名时,才算是正式出现了一位精通文献学的经学家。这是因为英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产生过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所推动的经学之间的隔阂,相反,由于英国的经学向来为教会里的主教、院长、牧师、教师、书记等宗教人士所掌控,所从事的经学研究与所提倡的经院哲学般的神学教育并无二样,两者的学术活动一直是并驾齐驱的。而在意大利,尽管有些人文主义者表面上与教会有关,但是他们又自认为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教会的成员。所以,本特利之前的这些英国教会里的经学家不同于以经学为目的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只是以经学作为方法和手段来达到其经院哲学上的目的,进而造成了一个在真正经学家看来纯属本末倒置的局面。在西方文化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经典文学的研究一般都是神学教学和传播的辅助,前者通常从属于后者。圣经研究和教会主教神父的著作也总是占有绝对的优势。<sup>④</sup>早期英国大学里的学科就以神学、哲学、法学、医学等为主次排序,并不包括经典文学的研究,更谈不上校勘学的

① 尤里奇·冯·维拉莫威兹-莫仑道夫:《经学史》,54页。亨利库·斯塔佛纳斯(Henricus Stephanus, 1528—1598)是卡索邦的岳父,也是知名的学者和出版家。

② 罗伯托·魏斯(Roberto Weiss):《十五世纪英国的人文主义》(*Humanism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Blackwell, 1967。

① 安顿尼·格拉弗顿:《文本的辩护者》,146页。

② 同上,147页。

整理了。当会用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代表教会或国家出差当大使或文书时,常常仅用拉丁文来写信作文,很少需要阅读或书写希腊文,而渴望治经的学者只好去外国学习旅游。<sup>①</sup>如伊拉兹马斯造访英国时所结识的文友科莱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虽然都精通希腊文且有不少论著发表,但其所著的拉丁文法、希腊文献的拉丁文译本、哲学、医学和天文学等著作,皆属于教育和文学一类,而不是纯粹的经学著作。因此,C·O·布林克曾说十六世纪中叶最杰出的人物是教育家而不是批评家。<sup>②</sup>

而在本特利之前,托马斯·格塔克尔(Thomas Gataker, 1574—1654)要算是最杰出的英国学者了。他生在伦敦,自剑桥大学圣约翰书院学习之后,就当为牧师。其生活重点首在交友联谊,次为神学写作,最后才是学术研究。但他的学问很扎实,治经方面的著作有《新约圣经文风论》(*Dissertatio de stylo Novi Testam*) (1648)和马尔库斯·奥勒留(Marcus Antoninus, 121—180)的《沉思录》(*Meditations*)定本(1652)等。后者曾被C·O·布林克赞为复杂文本的成功整理,其注释表明研究者已切实把握了作者的写作心脉。<sup>③</sup>格塔克尔还有一部类似波利齐亚诺名作《杂记》(*Miscellanea*)的著作《记事杂录》(*Adversaria miscellanea*) (1651),也显示出他整理希腊文文献和诠释希腊戏剧的卓越才华。客观地说,在当时的希腊文献研究中,格塔克尔要比其他国家

的学者胜出一筹。<sup>①</sup>

比格塔克尔晚些的托马斯·格尔(Thomas Gale, 1635/1636—1702),则可以说是一位“业余”的经学家。他生在约克郡(Yorkshire),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于1666年就任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在1541年设立的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Greek),七年后又开始担任学校校长和学院院长。格尔在忙于这些教育管理行政事务之时,也乐于收集古抄本和整理古典学者尤其是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的定本,只是校勘训诂不够细心。他曾在了一篇前言里承认自己整理定本时,遇见错误并没有修正,而是“遵循前人的版本……将错误与荒谬之处留给读者自己去删掉”<sup>②</sup>。也许格尔对于校勘学的兴趣启迪过日后本特利的研究,但决不能说其校勘方法为后者提供了治学榜样。

但与格尔生活时代相交错的约翰·皮尔逊(John Pearson, 1613—1686),却能看作是本特利在校勘学方法上的前辈。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两所学院的院长,最后成为切斯特(Chester)城的主教。其校勘学涉及教会早期著作和经典文学,代表作是《为圣伊纳爵书信的真实性辩护》(*Vindiciae Epistolarm S. Ignatii*) (1672)。皮尔逊撰写此书的思维和分析令本特利十分信服,特别是其采用的叙述结构法给了后者的经学研究以深刻的启发和影响。皮尔逊也从事过编年学研究,整理了一些古典作家的文本。他关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公元前525/

① C·O·布林克(C. O. Brink):《英国经学史:本特利、波森和豪斯曼的历史回顾》(*The English Classical Scholarship: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Bentley, Porson and Housman*), J. Clarke, 1985, 11—12页。

② 同上, 13页。

③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 16页。

①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 16—17。普法伊佛:《经学史》, 卷2, 144页补充说, 当时很多英国学者的希腊文研究强于欧洲其他地方的学者, 但他们与格塔克尔一样, 只是兼职或业余的学者。

②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 18页。

524—456/455年)定本的训诂近于本特利治经的博学,所提出的修正建议也不乏类似本特利校勘的精确。但从总体上看,其经学学问的深广不及后者。

由以上三位本特利之前英国经学研究者的简介,不难看出,本特利的经学研究确实有其渊源。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他作出了开辟当时希腊文校勘学新途径的重大贡献。

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曾是牛津大学的主教,也是著名的评论家和经学家,被视为现代校勘学之父。<sup>①</sup>他生在英国北部的约克郡(Yorkshire),从小就随母亲学习拉丁文;1676年进入剑桥大学,1680年大学毕业,1683年获得硕士学位。本特利年轻时当过六年圣保罗大教堂院长爱德华·斯蒂林弗利博士(Dr. Edward Stillingfleet, 1635—1699)次子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几乎翻遍了饱学的斯蒂林弗利当时被视为英国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并编撰了自己所用的《主要训诂家引用作家之引得》(indexes of authors quoted by the principal scholiasts, 稿本)。<sup>②</sup>以后又随其所教学生转入了牛津大学,扩大了学术视野。当时牛津大学的藏书“积如丘山”,本特利潜心研读各学院特别是有名的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所藏的中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抄本,其乐无穷,以至于不愿就任母校剑桥大学的教职。

① 关于其生平与著作,见J·H·蒙克(J. H. Monk):《理查德·本特利神学博士的生平》(*The Life of Richard Bentley, D. D.*)第二版,二卷,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3;阿历山大·带斯(Alexander Dyce):《理查德·本特利全集》(*Works of Richard Bentley*),三卷,Francis Macpherson, 1836。

② C·O·布林克:《英国经学史》,25页。

但他在1690年又成了教会的助祭,1696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717年得到神学皇家学位,写有神学著作;曾于1692年和1694年,两次应邀参加知名自然哲学家和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所主办的系列演讲,竭力为教会辩护,反驳无神论者的抨击。

1700年本特利就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大力推行改革院士制、增加科学教授、提高学术水平以及维修建筑等一系列更新举措。<sup>①</sup>不过,他却难以和那些被他认为在学术成就上不如自己的学者相处。其执掌院长的三十年也可以说是与院士中的冤家对头争斗的三十年。这大大影响了他当时和以后的声誉。

169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行将出版馆藏的拜占庭编年史家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 约491—578)所编写的《编年史》(*Chronographia*)孤抄本,特请本特利过目审稿。他因此撰写了98页的长篇评论,作为附录同时刊出,史称《马拉拉斯札记》(*Epistula ad Millium*)。<sup>②</sup>该札记内容很丰富,包括有关抄本的训诂、佚失文献的钩沉、词源的阐明。其整理方法之严谨、思维之精辟、视野之广远、学问之深邃,震动了当时的英国经学界,令人钦佩。从此本特利的声名远播,传遍了欧洲。本特利也是当时首先采用本土语言写作经学论著的学者,其代表作《法拉里斯信札论》(*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所研讨的对象,为公元前六世纪西西里岛阿克拉嘎斯王国独裁者(Phalaris, Tyrant of Acragas, 执政约公元前570—554年)的信札。在此作中,他追随瓦拉,

①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29—34页。

② 带斯:《理查德·本特利全集》,卷2,238—365页。

通过校勘学和语用学的探究辨析,鉴定所论信札为中世纪的赝品。<sup>①</sup>就像戴震曾陷入《水经注》的抄袭公案一样,也有人诬告他有抄袭行为。不过,如果说戴震之案颇多争议,尚未澄清,那么理查德·本特利却明确表白自己无罪。<sup>②</sup>现代学者布林克曾给予本特利这些治经成绩以高度的评价,认为《马拉拉斯札记》和《法拉利斯信札论》两部书的问世,是“(英国)经学伟大时代的肇始”。<sup>③</sup>尤其是前者被誉为十九世纪德国经学盛期成果之概要。<sup>④</sup>

此外,本特利所整理的经典定本还有1712年的《贺拉斯曼》(Horace) 1726年的《特伦斯》(Terence)和1739年的《马尼留》(Manilius)。如今他有关《贺拉斯曼》的校勘工作获得了甚佳的赞誉,虽然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修订建议也有一些为今人视作不妥,但更有多达800多项得到了充分的肯定。<sup>⑤</sup>本特利整理上述这些古典文献所用的校勘方法,可以参考他的一句名言:“Nobis et ratio et res ipsa centum codicibus potiores sunt”(依靠理智和事实胜于依靠一百部抄本)。这种文献整理态度和手段在往昔较为久远的时代里,针对希腊、罗马古文献与其流传后世的抄本相隔很远的情况,应该说是很正确很切实的。但是当它被运用于整理距时不远的近代英国文学家作品时,由于所整理的文献的印刷和保存都比较好,所以其偏重于整理者主观的倾向有时就显得不甚妥

① 蒂斯:《理查德·本特利全集》,卷1。

②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52—153页。

③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41页。这句话详细分析了这两部书中第三章的小标题。

④ 同上,69页。

⑤ 同上,64—72页。

当了。<sup>①</sup>

本特利因上述显赫的经学成就而享誉英国学术界之后,便在1694年应邀担任圣詹姆斯宫皇家图书馆的馆长,同时也肩负起了剑桥大学出版社重组的大任,并为此购买了荷兰新产的印刷铅字,使得当时剑桥大学所印刷出版的书籍面貌一新,格外引人注目。<sup>②</sup>

尽管本特利对于神学的论辩、三一学院的更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改进和皇家图书馆的发展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在西方文化史上无人可以替代的最卓越的成就,还是其在校勘学领域里的伟大功绩与模范作用。普法伊佛曾就此指出:“即使本特利犯了很多甚至有时是离谱的错误,可是他对于提高学术批评水准的贡献却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的人。依照他关于语言、文法、风格和韵律的见解去进行考察探究总有益处。他作为一位实证批评家,在经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sup>③</sup>然而,由于本特利个性张狂自大,他所作出的显而易见的学术成就,有时甚至被低估或忽略。

理查德·波森(Richard Porson, 1759—1808)就校勘学的修正方面来说,是本特利以后唯一能与之媲美的继承者:这是因为其令人惊讶的强记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但他因为缺乏想象力且毫无欣赏文学的本能,所以无法继承本特利的第二种学术:文学批评。但就校勘学这一狭窄领域而言,他的成就卓越千古。

他生在英国东部诺福克(Norfolk)县的小镇。波森的小学老师称

① 布林克:《英国经学史》,第四章分析其校勘态度与方法。

② 同上,27—28页。

③ 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54页。

赞说,五十年来没有像波森兄弟这样杰出的学生。<sup>①</sup>他1774年转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后,其强记固然令人佩服,但其作文的能力欠佳,证明他的长处所在。1778年他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782年获得学士学位,1785年获得硕士学位。他被聘为院士,靠助学金过活。当时为了继续当院士,他得成为牧师。即使他深信英国国教会,他却不愿意混淆教会与职业的事情,所以失职了。以后他的朋友凑起一笔钱投资,让他靠利息而活。他过世后,这笔钱变成剑桥大学的波森奖学金的基金。1792年他终于得到剑桥大学希腊文教授的职位,任教了16年。他晚年因嗜酒而终于沉沦没顶。

他主要的作品是整理定本,收集训诂、纠错的笔记。<sup>②</sup>早期的著作多为书评。他对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与词汇书/百科全书《苏达》等尤其感兴趣。他的名作之一为《寄给特拉维斯副主教的信,答他的〈替三个天上的证人辩护,《约翰1书》第五章第七节〉》(Letters to Mr Archdeacon Travis, in Answer to His Defence of the Three Heavenly Witnesses, 1 John V. 7)。<sup>③</sup>他整理了《新约·约翰1书》的一些衍文,证明其为贗品。6卷《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称波森的《寄给特拉维斯副主教的信》为“本特利时代以来最精辟和精

准的校勘学上的著作”<sup>④</sup>。波森1795年的《埃斯库罗斯》定本为所有后世版本的基础。1797年问世的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约公元前480—406年)的《赫卡柏》(Hecuba)的定本包含有关古希腊文诗格规则的讨论,1802年的第二版保留原版序言的一篇“附录”,更清楚地分析与解释短长格(iambic meter)。由于其修正提议的正确、逻辑的严谨、举例的广泛,该“附录”被后世视为其学术特点的典范和学术贡献的高峰。其他的定本包括1789年的《奥雷斯特斯》(Orestes)、1799年的《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以及1801年《美狄亚》(Medea)。其《杂记》(Adversaria)是在他死后的1812年由朋友编辑出版的。

波森的评价为校勘方面的精辟度比本特利高,对版本价值的敏感度比本特利劣,上文已提到他缺乏想象力的缺陷。他与本特利一样评论其他经学对手时,过火地抨击其弱点,轻视其优点,语气过于消极。尽管如此,在纯粹校勘学方面,连本特利也瞠乎其后。

① 关于其生平与人格,见《理查德·波森:生平小传》(Richard Porson: A Biographical Essay), Cambridge, 1937。

② 关于其学术成果,见C·O·布林克:《英国经学史》,99—113页;普法伊佛:《经学史》,卷2,159—160页。

③ 1788、1789年分别发表为文章,第二年汇成书出版: T. and J. Egerton, 1790。

④ 吉本:《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Georg A. Bonnard, 1966, 174页。